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  
National School of Development



**NSD**

第008期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  
**简报**

2022年7月

# 目 录

## 本期导读

01

## 学术聚焦

02

|  |    |
|--|----|
| 影响当前经济形势的主要因素与对策 黄益平 .....                             | 02 |
| 新冠疫情影响的不平等性 刘国恩 .....                                  | 04 |
| 房地产的短期提振举措与效果观察 赵波 .....                               | 06 |
| 提振消费可考虑尽快发放生活补贴 沈艳 .....                               | 10 |
| 失业人群与困难家庭需要直接的社会救助 张丹丹 .....                           | 14 |
| 我国就业形势再探讨 卢锋 .....                                     | 17 |
| 对话 提振中国经济：复杂性、紧要性与策略性<br>黄益平、刘国恩、卢锋、沈艳、张丹丹、赵波、黄卓 ..... | 21 |

## 月度精选

25

|  |    |
|--|----|
| 中国经济的重大新挑战与应对 林毅夫 .....                  | 25 |
| 企业越是艰难，越要把“触角”伸出去 周其仁 .....              | 29 |
| 如何理解数字经济的新方针与产业未来？ 刘世锦、刘尚希、黄益平、姚建明 ..... | 33 |
| 我国双碳目标的背景、产业逻辑与政策原则 王敏 .....             | 44 |
| 曾国藩如何走出极困极难时刻 宫玉振 .....                  | 53 |

## 学院资讯

61



# 本期 导读

北大国发院简报

第008期

亲爱的读者：

感谢您的订阅，《北大国发院简报》第8期与您见面了。每一期，我们的原则都是一样的，在信息过载、高噪音、碎片化的时代，为您精选高质量的内容，同时也方便您用相对集中的时间深度阅读。

本期简报内容主要还是“学术聚焦”与“月度精选”两大内容。

“学术聚焦”的内容来自国发院智库与传播中心在6月8日举办的第61期中国经济观察报告会，主题是“提振中国经济：复杂性、紧要与策略性”。面对上半年新冠疫情和国际局势的复杂性，中国经济如何总结复盘，如何用好下半年更显紧要与策略性。为此，黄益平教授、刘国恩教授、卢锋教授、沈艳教授、张丹丹长聘副教授、赵波长聘副教授及黄卓长聘副教授（对话主持人）等多位国发院学者分别从宏观经济形势与对策、新冠疫情影响的不平等性、就业形势

分析、提振消费的举措、疫情期间社会救助的中西比较、房地产的短期提振与长期发展等不同角度，分享了他们各自的最新研究与深刻见解，并进行了圆桌对话。

本期的“月度精选”有五篇文章，分别是林毅夫教授在其新书《中国与西方》发布会上对中国经济的重大新挑战与应对之策的解读，周其仁教授在佛山给企业家带来的智慧分享，刘世锦、刘尚希、黄益平、姚建明等四位学者对于我国数字经济新方针与产业未来的探讨，王敏长聘副教授对我国双碳目标的背景、产业逻辑与政策原则的详细梳理，以及宫玉振教授对曾国藩走出极困极难时刻的关键要素分析，希望大家能古为今用。

感谢您的阅读，也欢迎您的反馈。在简报最后，我们附有订阅二维码和联系方式。

主编：黄卓  
执行主编：王贤青  
2022年7月31日



## 影响当前经济形势的主要因素与对策<sup>1</sup>

黄益平

北大国发院副院长、数字金融研究中心主任

2021年初和2022年初，我都曾对中国经济前景做过分析，但后来的发展都比我之前的预期弱很多。2021年疫情可控，但宏观刺激政策退出稍早了些，同时实施了一系列旨在提高经济发展质量的结构性改革政策，包括平台经济治理、房地产泡沫防范、“双碳”目标等等，但这些政策的执行力度没有掌握好，加大了经济下行的压力。今年年初，我的预期是中国经济会在宏观政策的推动下，稳步反弹，但实际上，四、五月份经济下跌得很厉害。

经济学者的预期不准确，不是一件值得自豪的事情，但却是一个司空见惯的现象。原因在于，所有的预期都是基于已有的信息所作的判断，如果后来发生了之前没有预料到的事件，比如新冠疫情对经济的冲击突然加大，实际经济走向自然就会偏离原先的预期。对于经济学者来说，预期错了就应该承认，但最重要的是要搞清楚错在哪里，是原先的分析不对，还是发生了突发事件。

### 影响当前经济形势的三大因素

2021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我国经济发展面临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为什么会这样？

2021年一季度GDP同比增长18.4%。但之后尤其在三、四季度，经济形势急转直下，减速幅度远超市场预期。这可能主要是两方面的原因所致：一是包括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在内的宏观经济刺激政策退出偏早，2021年上半年财政出现了盈余；二是当年我国推出了一系列结构性改革政策，比如针对平台经济、教培行业、房地产、双碳等领域采取的政策措施。这些政策对于我国经济走向高质量发展，十分必要，但在执行过程中出现了后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所称的“长期政策短期化”“系统性战略碎片化”等偏差，短期内加大了经济下行的压力。

1. 本文根据黄益平在2022年6月8日北大国发院第61期中国经济观察报告会（CEO）上的演讲整理。

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年初的两会都提到，经济工作要稳字当头、稳中求进。事实上已经看到一些政策调整，宏观经济政策特别是财政政策变得更加积极，货币政策也逐步宽松，相信这些会对经济增长起到支持作用。与此同时，一系列结构性政策似乎也在调整。比如平台经济领域，中央明确从过去的专项整治转向日常性监管，甚至要大力支持平台企业创新。可见，政策已经在调整，但这些调整能以多快的速度、在多大程度上扭转经济的势头，还需要再观察。

2022年还发生了三件事，对经济的影响甚至超过了去年。

一是俄乌冲突。这是完全没有预料到的。短期看，该事件影响了投资者情绪，对金融市场带来一些影响。与此同时，该事件抬升了大宗商品和农产品价格，对各国经济来说，通胀压力可能会进一步提升，经济活动却有可能再次减弱。

二是美联储加息。这件事情早在预料之中，但可能会发生得更快、更猛。美联储加息可能给许多发展中国家带来压力。作为全世界最重要的央行，一旦美联储收紧货币政策，国际金融市场的流动性会因此减少，发展中国家可能面临资本外流、货币贬值、资产价格下降的风险挑战，对金融市场和实体经济都会造成影响。我国也同样面临挑战，特别是当前我国需要放松货币政策支持经济稳定，美联储加息会挤压央行的政策空间。

三是新冠疫情。最近几个月的新冠疫情，导致经济活动减少甚至陷入停顿，影响远超预期，这也是造成当前经济疲软的最主要因素。假如疫情很快过去，经济活动或许能很快反弹，但目前疫情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

## 提振经济的对策

那么，当前有什么经济政策选择？

第一，要想办法尽快控制住疫情，尽最大努力减少疫情对经济活动的冲击。这是当下面临的首要挑战。

第二，宏观经济政策的刺激力度可以再大一些。最近一段时期，决策部门一直在释放稳增长的政策信号，但这些信号对市场信心的刺激作用延续时间很短。有的市场参与者对政策力度有疑虑，决策部门在表示要稳经济的同时又说财政、货币政策空间有限。也许可以考虑宣布力度比较大的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刺激措施。毕竟宏观政策的一个重要功能，如果能把市场参与者的信心大幅提振起来，经济复苏的可能性自然就会加大。

第三，尽快落地几条看得见、摸得着的结构性政策，争取立竿见影地支持经济增长。最近几个月来，决策部门一直在强调“双碳目标”是一个长期性目标，不能运动式减碳，决策部门也一再表示要支持平台经济创新。也许应该考虑宣布几项马上能够执行同时深具影响力的措施。同样，这些经济中的关键行业的信心提升了，稳增长也就会更加容易实现。

第四，在有条件的情况下，对身陷困境的中小微企业和低收入家庭采取一些直达型的纾困措施。新冠疫情已经进入第三年，或许它不会马上消失。在这种情况下，企业与家庭都承受了十分巨大的现金流与收入压力，如果政府可以直接利用财政资源提供直接支持，相信对于稳经济、稳民生、稳消费，都十分重要。毕竟经济复苏的前提是要让大家都能先活下来，至于一些专家担心的效率问题、公平问题，在生死面前都应该退居第二位，纾困本来就是大危机中的一次性措施。





## 新冠疫情影响的不平等性<sup>2</sup>

刘国恩

北大国发院教授、北大全球健康发展研究院院长、中国卫生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2022年4月至5月，新一波以奥密克戎为主的新冠疫情在国内爆发，中国经济受到严重冲击。经济学家们预测，今年一、第二季度的经济增长将面临巨大的压力。世界银行6月发布的《中国经济简报》称，中国2022年的真实GDP增速可能大幅放缓至4.3%，比去年12月的预测值下调0.8个百分点。世行报告认为，中国为实现高质量增长应从三方面采取果断行动，一是提高消费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二是解决社会不平等问题，三是重振创新和生产率增长，包括对中国实现“双碳”目标至关重要的技术创新。

下面我从两个方面讨论疫情的影响：生命健康与个人收入，重点是对弱势群体更严重的不平等影响。

### 疫情影响的不同维度

疫情对生命健康的影响可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对人口预期寿命的影响，主要因为极端情况的死亡，导致人均预期寿命降低；另一种是患者虽未死亡，却留下严重疾病、残疾等后遗症，影响总体健康水平。

疫情对个人收入的影响也可从两个层面分析。一是疫情严重影响弱势群体的收入，增加返贫人

口，影响脱贫攻坚的成果。二是疫情导致更多人的收入下降，虽未降至贫困线以下，但仍然影响人们的生活质量。基于目前初步分析，我们这里只报告疫情对健康和收入的两种极端影响：生命损失与贫困人口。

世行近期的研究报告显示，2020年以来，全球疫情对低收入、中等收入和高收入国家造成的生命和贫困影响具有明显的结构性差异。对于低收入国家，所受影响主要是贫困人口的风险增加，部分原因与低收入国家主要分布在赤道热带有关，疫情对当地人口的死亡风险相对较小，但个人收入受到全球市场下行的影响更严重。对于高收入国家，疫情导致的贫困影响则相对更小，而生命损失更为显著。

该报告显示，中国作为中等收入国家，因为严格的疫情防控措施，避免了不少当下的生命损失，同时也付出了相对更大的社会经济与收入影响的损失。

### 疫情对收入影响的不平等性

在关注疫情对宏观经济总体影响的同时，因为不同地区和不同收入的人群受到的疫情冲击很不一样，因此有必要关注疫情影响的不平等性。

2. 本文根据刘国恩在2022年6月8日北大国发院第61期中国经济观察报告会（CEO）上的演讲整理。

北师大一个研究团队应用CGA模型的分析显示，2020年全国人均收入下跌7.87%，但处于收入最低10%的人群收入下降17.48%，远高于平均水平。

使用北京大学“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我们实证测算了2020年疫情对贫困人口的影响情况。根据世界银行对各国贫困线的划分：一条是针对低收入国家的绝对贫困线(1.9美元/人/天)；一条是针对中等收入以上的国家根据其收入水平划分的相对贫困线，其中包括中高收入组的5.5美元/人/天，以及高收入组的21.7美元/人/天。基于1.9美元的绝对贫困线进行测算，我们在2020年处于绝对贫困线下的人口约7061万。根据经济学的“反事实分析”，假如未发生疫情的话，绝对贫困线下的人口可能降至5648万，这意味着疫情使1412万人陷入绝对贫困线下。如果基于中高收入组的5.5美元贫困线标准(即每月¥1089元)，2020年的相对贫困人口为2亿9655万，其中因为疫情对经济的冲击，直接导致了近4236万低收入者陷入相对贫困线之下。

## 疫情对就业冲击的不平等性

从疫情对就业的冲击来看，疫情导致总体失业率上升，同时也使就业结构的不平等问题加重。根据相关统计数据，2022年4月，全国16岁-24岁年龄段人口的失业率超过18%以上，25岁-59岁年龄段城镇人口的失业率超过6%，还有大量的农民工未能再进城务工。失业率高导致弱势群

体的收入大幅下降，从而加重收入不平等程度。

事实上，在总体失业率增加的大背景下，弱势群体受到的影响更加严重。北大国发院2022年的一篇研究生论文研究了疫情对劳动力市场用工结构的影响。通过分析2020年全国上市公司的公开工作招聘信息，研究发现新冠疫情虽然导致上市公司的用工需求整体下降，但因为疫情对线上工作的数字化转型要求越来越多，上市公司的劳动用工向更高学历、更高技能的方向转变，从而使具有硕士及以上学历的用工需求反而增加22.6%；具有本科学历要求的工作需求增加12.8%。相反，对大专学历的用工需求减少26%，高中学历的用工需求减少38.2%，中专和技校学历的用工需求减少48%左右，而负面影响最大的是学历不限的用工需求，其降幅高达81%。

由此可见，疫情导致的就业不平等非常突出，弱势群体的积蓄本身就非常脆弱，如果再面临当下收入不进的问题，其民生后果可想而知。

如今，疫情仍在继续，如何精准、科学的进行防控，需要全面评估病毒风险和经济风险的“取舍”关系，尤其需要充分考虑大量从事体力劳动的弱势群体几乎无法从线下切换到线上劳动的客观现实，“一刀切”的防控要求对于低收入人群而言，势必导致不能无视的规模性返贫风险。因此，无论是为了加强保障民生的脱贫攻坚，还是推进共同富裕的国家宏伟目标，在继续疫情防控的过程中，其相关公共政策制定和社会资源配置都亟待对低收入、低学历的弱势群体给予更多的具体考虑和帮扶。



## 房地产的短期提振举措与效果观察<sup>3</sup>

赵波

北大国发院经济学长聘副教授

### 政策背景

“房住不炒”政策已经实施将近6年，我国过快增长的房价得到显著控制，主要城市的租金房价比已经趋于稳定。在这段时期，个别房企出现一些“爆雷”的情况。因此，国家提出房地产企业存在高负债、高杠杆、高周转的“三高”风险，容易引发房地产泡沫，甚至诱发系统性金融风险。针对上述情况，国家落实一系列的政策，这也是此轮调控最主要的诱发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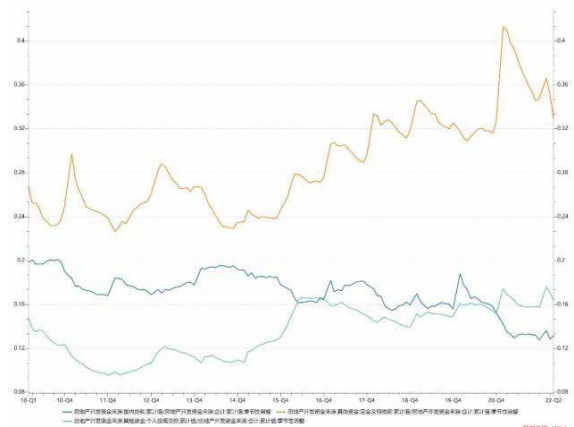
政策一：2021年8月，央行和住建部提出“三条红线”的要求，规定房地产企业的剔除预收款的资产负债率不得大于70%；净负债率不得大于100%；现金短债比不得小于1倍。房地产企业如果三条红线全部踩中就会被归为红档，其有息债务余额就不得增加。每减少一条红线，企业的债务增速上限会增加5%。按照相关监管要求，上述措施自2021年1月起开始执行，目标是在2023年底力争所有房企达标转绿档。

政策二：之后，央行和银保监会又针对房地产贷款做出进一步调控，建立房地产贷款集中管理制度，要求房地产和个人贷款分开管理。针对不同规模的银行，分别设定房地产和个人贷款余额占比上限，大型银行为40%和32.5%，中型银行为27.5%和20%，小型银行和非县域农合机构为22.5%和7.5%。

政策三：随着一些爆雷的房地产企业的信息陆续公布，各地方政府为了完成“保交楼”的目标，采取了各种监管措施，其中一项就是加强对房地产企业的商品房预售资金的监管。这对于已经承受“三条红线”压力的房企来说，无疑继续加重了其流动性的困难。

#### （一）房地产行业资金流动性受到巨大冲击

房地产的开发资金主要来源于定金和预售款，还有一个来源是国内贷款。从下图可以看出，自从“三条红线”政策出台后，房地产企业资金来源中的国内贷款占比，首次低于个人按揭贷款占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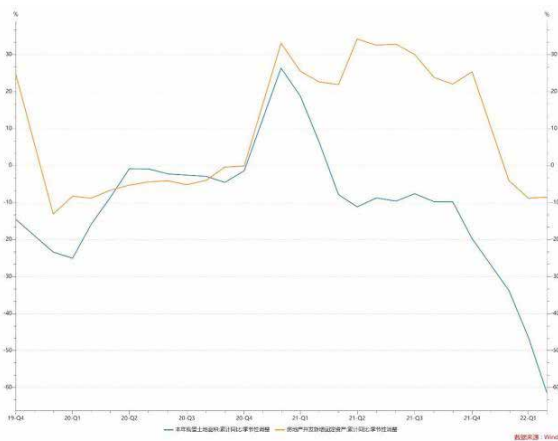


从下图中不难看出，房地产企业资金也遇到困难，企业不敢投资，也不敢购地。4月累计的土地购置面积显示，同比增速为-61%，为

3. 本文根据赵波在2022年6月8日北大国发院第61期中国经济观察报告会（CEO）上的演讲整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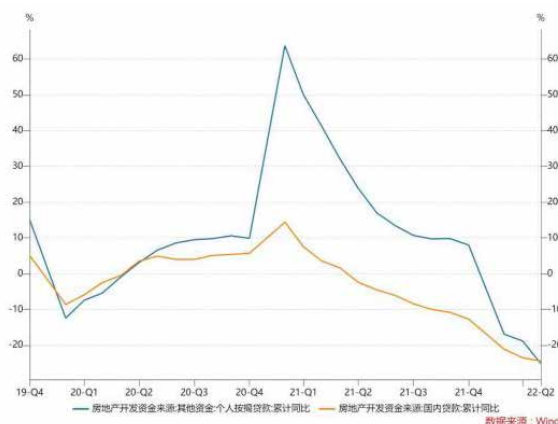


1998年房地产市场化以来的最低水平。上市公司的数据进一步显示,相比大型企业和国有房企,中小型房企和民营房企承担的流动性压力最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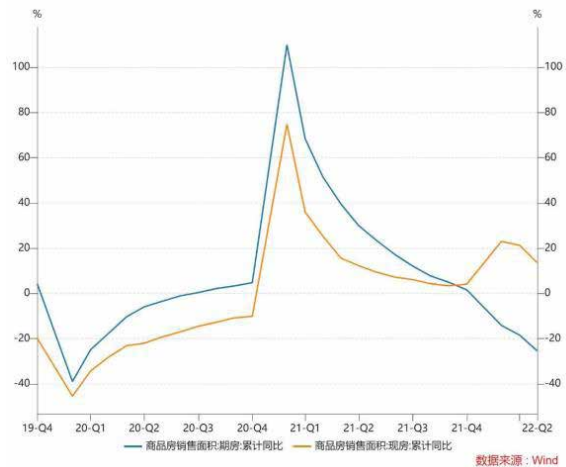
## (二) 房地产贷款增速再次转负

个人房贷的增速大幅度下降。如下图所示,黄色线显示的是房地产开发资金的国内贷款占比,蓝色线显示的是个人按揭贷款占比。不难看出在2020年的新冠疫情集中暴发之后有一个强劲的复苏,但此后随着新政出台,个人贷款增速持续下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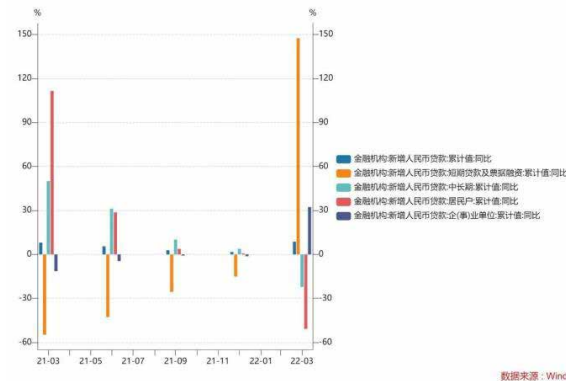
个人贷款受到影响,个人资金不足都会影响房地产销售。下图中的两条线显示了现房销售和

期房销售的变化,不难看出2021年第四季度之后,现房销售有所回暖,但期房销售的同比增速依旧下滑。我认为这与各地出台的预售资金管理有一定关系。



## 社融增长的结构变化

截至4月底,在新增社融各主要组成部分中,增长较快的是政府债券以及企业债融资,股票融资受股票市场影响增长不快。新增人民币贷款受到房地产调控影响,居民户贷款和中长期贷款大幅下降。短期贷款和票据融资激增,除了去年同期基数较低的影响外,主要还是受到央行近几个月释放流动性有关,银行“以票充贷”的行为造成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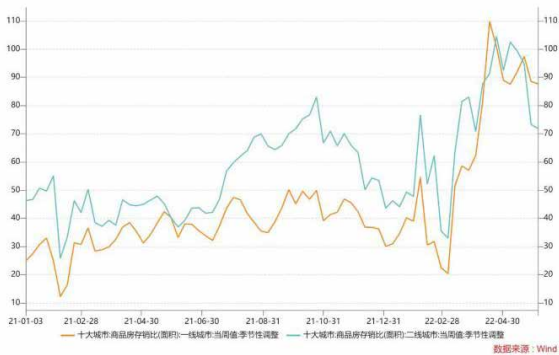


## 短期提振措施及潜在刺激效果

今年我国稳增长的目标是 5.5%，目前看压力非常大。各地楼市从今年开始迎来大松绑，包括北上广等一线城市在内，已经有超过 130 个城市出台了各种各样的调控松绑措施，包括降低房贷首付比，放宽限购限售门槛，针对商品房预售资金监管过严进行纠偏等。央行的货币政策方面，5 年期 LPR（贷款基础利率）下调了 20 个基点，这也是多年来的首次调整。首套房贷款利率在此基础上可以进一步下调 20 个基点。

短期提振效果能有多大？前面提到的“三条红线”和集中贷款管理，这些措施控制了房地产信贷总量的供给增长。面对经济下行压力逐步增大的现实情况，我国从今年开始逐步放开了个人房贷利率，减少限购限贷等差异化措施。这样一套政策“组合拳”一方面避免了大水漫灌风险和潜在金融风险，有助于化解房地产库存，在一定程度上提升房地产企业的流动性；另一方面，由于前期监管措施的影响还在，上述政策对于房地产的刺激效果难免打一些折扣。

从 5 月下旬开始，到 6 月初这段时间，一线和二线城市去化率（存销比）有所下降。二线城市，去化率下降得更快，而一线城市面临压力较大。这一特征是否会持续，还有待观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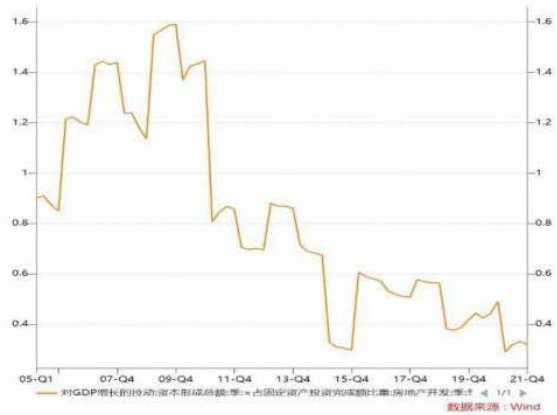


### （一）对总需求的刺激

房地产开发投资是固定资产投资重要的一部

分，过去四年来其占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比例一直上升，目前已经达到 30% 左右。由于投资是拉动 GDP 增长的直接动力之一，我们可以简单测算房地产投资对 GDP 增速的贡献。

下图显示过去十年间，我国宏观经济整体投资率持续下降，所以房地产投资对于 GDP 增速的直接贡献也在逐步下降，从 2009 年最高时的 1.6% 下降到现在不到 0.4%。从这方面来看，房地产投资对于总需求的直接刺激可能要比我们想象中的小。



### （二）产业关联作用

房地产行业本身比较特殊，不少专家学者认为即便它带来的投资刺激有限，但是由于其产业链长，在拉动经济增长方面可能会发挥更大的作用。我的初步研究发现，房地产的产业带动作用可能被夸大了。

房地产业可以带来两方面的关联效应，一是后向关联效应，指的是给上游产业带来需求效果，即房地产行业每增加一单位的产出，能够诱发多少对于上游环节的需求；二是前向关联效应，指的是房地产行业每增加一单位的产出，对于下游所产生的影响。

广义的房地产包含了第三产业的房地产业和第二产业中的建筑业，基于 2020 年 42 部门的投入产出数据，我们发现房地产和建筑业的关联

效应并不突出。从下图不难看出，前向关联行业排名前五的有石油天然气开采、金属矿采选、煤炭采选等能源行业，房地产行业的前向关联效应只有 1.1，而建筑业只有 0.07。后向关联行业位居前列的是通讯设备、计算机、电子器材和交通运输等。建筑业的后向关联效应比较高，达到 2.09，房地产业的后向关联效应比较低，只有 0.6。通过两者加总可以得到总的关联效应。不难看出，在所有 42 个部门中，房地产业和建筑业对整体经济的拉动作用并不是最强的。

| 排名 | 前向关联           | 后向关联                | 总效应                  |
|----|----------------|---------------------|----------------------|
| 1  | 石油天然气开采<br>8.9 | 通信设备、计算机、电子设备<br>3  | 石油天然气开采<br>9.9       |
| 2  | 金属矿采选<br>8.5   | 电子机械和器材<br>2.5      | 金属矿采选<br>9.7         |
| 3  | 煤炭采选<br>4.2    | 交通运输设备<br>2.46      | 通信设备、计算机、电子设备<br>5.5 |
| 4  | 非金属矿<br>3.8    | 仪器仪表<br>2.4         | 仪器仪表<br>5.45         |
| 5  | 其他制造业<br>3.3   | 纺织、服装、鞋帽、皮革等<br>2.4 | 煤炭采选<br>5.4          |
|    | 房地产业<br>1.1    | 房地产业<br>0.6         | 房地产业<br>1.42         |
|    | 建筑业<br>0.07    | 建筑业<br>2.09         | 建筑业<br>2.2           |

可见即使考虑到产业关联的拉动作用，房地产业不是一个突出的行业。为何房地产引起如此多的关注？一是房地产的金融属性。虽然房地产总效应只有 1.42，但其带动的第一行业是金融，房地产既对于金融有大量需求，也为金融行业的生产提供了中间品投入这也是为什么针对房地产金融贷款进行控制，会大幅度影响到房地产的发展。二是房地产带动的土地出让收入也是地方政府的财政重要来源三是房地产资产是居民资产负债表中最重要的资产，跟民生息息相关。

### （三）收入和财富效应

房地产对于经济的第三个带动作用来自于收入和财富效应。

第一，收入效应指的是由于利率下降，带来收入增加效果。房贷利率降低可以减少利息支付，这样一来，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就会增加，从而提高消费，拉动内需。根据微观数据的估计，居民可支配收入每增加 1 个百分点，消费增长率会提高 0.14 个百分点。

第二，财富效应指的是房价上升对于住房拥有者的消费刺激效果。假设利率能够持续下降，在未来半年内带来房价的上升，那房产财富的增加会促进住房拥有者的消费进一步增长。房屋价值增长率每提高 1 个百分点，消费增长率会提高 0.09 个百分点。但须注意到，房价上升带了租房者和购房者的成本增加，所以总的财富效应要更小一点。

### 小结

目前的房地产的短期提振措施，对于化解房地产业的流动性风险，避免系统性金融危机更有为有效，但对于经济的刺激作用可能不如预期那么大。背后的原因较为复杂，既与刺激强度有关，也与房地产本身的性质有关。应对 2022 年的保增长挑战，要适当的对于之前的房地产政策进行纠偏，包括对三条红线政策作出适当调整，避免长期政策短期化。



## 提振消费可考虑尽快发放生活补贴<sup>4</sup>

沈艳

北大国发院经济学教授、北大数字金融研究中心副主任、教育部 - 北京大学人力资本与国家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

关于这个话题，我们北大国发院的林毅夫老师、姚洋老师、黄益平老师都分别在多个场合讲过，我今天最主要想说的是：要提振经济当中的消费部分，需要尽快考虑给居民发放生活补贴。

新冠疫情爆发以来，我国在处理疫情中一直将“保市场主体”作为政策重点，过往确实在稳经济、保民生方面成绩斐然。

但是，当下我们遇到的困难是消费不振，继而导致经济难以反弹。其中比较明显的一个原因是，疫情的反复不仅影响了经济活动，更影响了消费者预期。从时间层面看，疫情已经进入第三年，不少家庭的收入能力受到较大影响，并且，不少家庭的储蓄已经消耗殆尽。从结构层面看，低收入家庭、全靠打工劳动获得收入的家庭，其生活已经十分困难，很可能返贫，这部分人群值得特别关注。

习总书记强调，关注民生要“把所有的精力都用在让老百姓过好日子上”。所以，我们国发院研究团队建议，尽快安排直接向居民发放生活补贴，可以包括现金和消费券两个部分，额度大致可以考虑每人现金约500元、消费券约500元。

### 消费不足的矛盾十分突出

我们为什么提出这个建议？因为当下我国消

费不足的矛盾相当突出。从2022年3月以来，消费出现了四个新特征：下滑程度深、线上线下共振、地域广、牵涉行业多。

首先看全国社会消费品零售分行业的当月同比数据（图1）。

|           | 2022年 |       |       | 2019年 |      |      |
|-----------|-------|-------|-------|-------|------|------|
|           | 2月    | 3月    | 4月    | 2月    | 3月   | 4月   |
|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       | -3.5  | -11.1 |       | 8.7  | 7.2  |
| 商品零售      |       | -2.1  | -9.7  |       | 8.6  | 7.0  |
| 餐饮收入      |       | -16.4 | -22.7 |       | 9.5  | 8.5  |
| 网上零售额累计值  | 10.2  | 6.6   | 3.3   | 13.6  | 15.3 | 17.8 |

图 1

数据显示，今年3月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比去年同期下降了4%，4月则比去年同期降了11%。商品零售额在今年3月和4月分别比去年同期下降2%和10%。餐饮收入则分别下降16.4%和22.7%。

是不是线下消费的减少转移到了线上？答案是否定的。网上零售额只是略有增加，3月和4月的增加额远不足以抵消相应商品的线下降幅，尤其是4月。很多消费，如餐饮，一旦消失就随之而去，谁也不会轻易补办昨天取消的宴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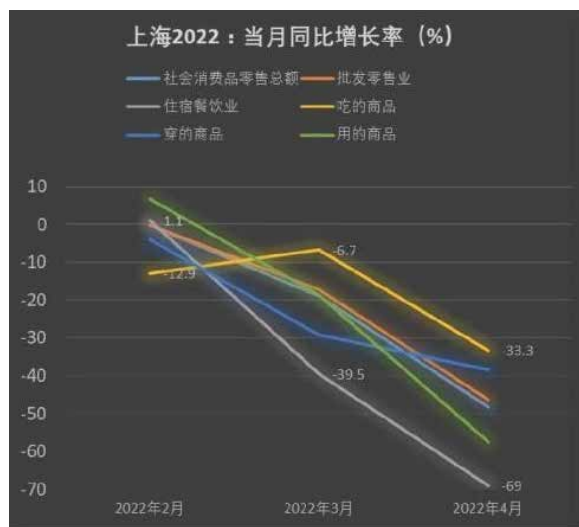
3月和4月的消费严重下降也不是时间或季节原因。2019年和2018年比，3月和4月的所有数据都是正向增长的。这就表明，疫情本身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因素。

4. 本文根据沈艳在2022年6月8日北大国发院第61期中国经济观察报告会（CEO）上的演讲整理。

关于疫情的影响，我们再挑两个典型地区来看：上海和吉林。



图 2



数据来源：上海市统计局 <https://tjj.sh.gov.cn/ydsj51/index.html>

图 3

上海 2019 年 2 月因为春节原因，吃的商品有所下跌，但总体来看，同年 3 月和 4 月全都是上升态势。2022 年上海的同时间数据出现很深的下跌。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跌幅达到 48.3%，尤其是餐饮，4 月比去年同期少近 70%，最抗跌的食品也跌掉三分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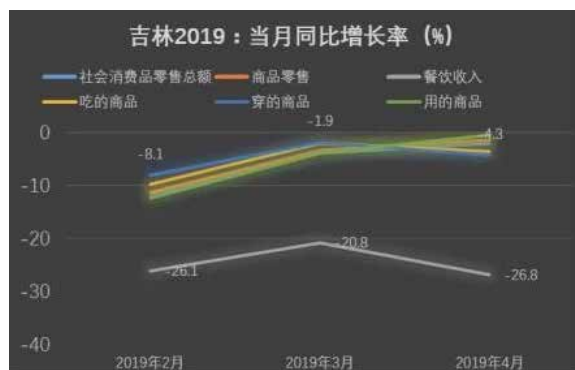


图 4



图 5

吉林的情况也很值得关注。2019 年（图 4）吉林人的消费就已经在节衣缩食，2022 年 2 月还勉强有些领域保持在正区间，到 3 月和 4 月（图 5）都急剧下降，有些甚至跌幅 90%。吉林的数据当中，服装消费跌去 90%，生活用品跌去 65.6%，其中汽车下跌 90%，珠宝消费几乎为零。整个 4 月，吉林只有一样消费是正向的——中西药品类。





因此，无论从全国总体数据，还是从吉林和上海的数据，都可以很明显地看到，消费下跌的矛盾非常突出。

## 为什么要尽快发放生活补贴？

问题已经比较严重，该怎么解决？我们研究团队的建议是尽快发放生活补贴，此时，保老百姓生活就是保中小微企业，也是保社会稳定。

为什么这么说？

第一，当经济下行时，传统的稳增长措施是增加基建的财政资金支持。但是，本次的经济下行原因不同于以往。现在是新冠疫情防控导致的经济活动减少甚至停顿，所以有投资，也无法让经济活跃起来。并且，增加政府的投资支出虽然有助于提升总需求，但“远水不解近渴”，投资到消费的传导链条非常长，而且短期内触达面也有限。很多老百姓口袋里已经没钱，下个月如何生存已成问题，一个很长期的投资是不能解决眼前的问题。

第二，我国有直接发放补贴，保老百姓生活的政策空间。美国在疫情早期采取了保老百姓生活的做法，多次进行现金补贴。这一做法的好处是消费需求保持稳定，不足之处是价格出现大幅上升，导致严重的通货膨胀。我国到目前为止一直重点保企业，疫情控制得力的情况下，生产秩序恢复较快。但问题是，由于居民收入受疫情影响也很大，社会保障体系又不健全，导致消费需求不振。当然，“硬币的另一面”是，由于消费需求不振，价格处于较低水平，因此这给我们留下了通过发放补贴来提振消费的空间。

第三，发放生活补贴符合我国财政政策重点从投资转向民生的大方向。在消费券发放方面，国内外也有经验。

## 消费券发放的香港经验与大陆现状

大陆如果考虑发放补贴，可以将香港模式作为一个参考。

| 名称           | 时间      | 金额          | 对象                  | 领取方式                | 发放方式                                  | 消费限制                           |                        |
|--------------|---------|-------------|---------------------|---------------------|---------------------------------------|--------------------------------|------------------------|
| 10000元现金发放计划 | 2020年6月 | 10000元      | 年满18岁的香港永久性居民和新来港人士 | 进行电子或书面登记           | 转账及邮寄现金，一次性发放                         | 无                              |                        |
| 第一轮消费券计划     | 2021年8月 | 5000元       | 年满18岁的香港永久性居民和新来港人士 | 进行电子或书面登记           | 通过支付宝、香港、八达通、Tap&Go、Wechat Pay、HK分期发放 |                                |                        |
| 第二轮消费券计划     | 第一阶段    | 2022年4月     | 5000元               | 在第一轮消费券计划中登记过的市民    | 无需登记，直接领取                             | 同上                             | 有效期约5个月，限于本地零售、餐饮及服务行业 |
|              | 第二阶段    | 2022年年中（预计） | 5000元               | 年满18岁的香港永久性居民和新来港人士 | 未登记过的合资格市民进行电子或书面登记                   | 上面四种+PayMe from HSBC、BoC Pay发放 |                        |

图6 香港现金与消费券发放情况

2020年6月以来，香港一共发放现金1万元/人，消费券1万5千元/人（分两轮发放）。在发放对象的选择上比较普适性，包括年满18岁的香港永久居民和新来港人士。领取方式比较简洁，进行电子或书面登记，甚至发放消费券的第一轮已无需登记。发放方式方面，数字方式发挥了作用，数字平台之间既有竞争，也有合作。现金没有消费限制，而消费券的限制主要集中在零售、餐饮、服务业。

香港消费券发放效果如何呢？根据研究测算，100元消费券可以拉动109元消费，并且大部分提振主要体现在非耐用消费品上（Geng, Shi and Song 2022）。

我们对中国大陆2020年消费券发放效果做过评估（林毅夫、沈艳、孙昂）。结果发现，中国消费券发放的刺激效果远高于国外。北大也有其他研究团队得到相似结论。在第三产业占比较高的地区，消费券显著增加了交易活跃程度。定向发放给低收入人群的消费券对于增加消费有明显提振作用。

| 省市  | 时间        | 消费券 (万) | 绿色家电 | 新能源汽车 | 餐饮 | 购物 | 旅游 |
|-----|-----------|---------|------|-------|----|----|----|
| 海南省 | 2022/4/29 | 20000+  | √    |       | √  | √  |    |
| 广州市 | 2022/5/7  | 10000   |      | √     | √  | √  |    |
| 成都市 | 2022/5/20 | 24000   |      |       | √  | √  |    |
| 潍坊市 | 2022/5/22 | 7000    |      |       | √  | √  |    |
| 深圳市 | 2022/5/23 | 不明确     | √    | √     | √  | √  | √  |
| 贵州省 | 2022/5/24 | 30000   |      |       | √  | √  | √  |
| 湖北省 | 2022/5/25 | 不明确     |      | √     | √  | √  | √  |
| 上海市 | 2022/5/29 | 不明确     | √    | √     | √  | √  | √  |

图 7

我们目前的现状是，2022 年有不少省份开始发放消费券，但是总体来看规模较小，范围也较有限。图 7 是 2022 年 4 月至今发放消费券的一些省市的情况。具体涉及的行业当中，餐饮和购物是各省市都有的。国务院 4 月 25 日颁布了《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释放消费潜力促进消费持续恢复的意见》，其中强调了绿色的部分，所以绿色家电、新能源汽车的提振措施在不同省市分别有所体现，这是一个新亮点。

## 如何发放生活补贴？

最后的关键点是——生活补贴怎么发。我们有以下建议：

**发放主体：**过去是地方自主发放，但我们建议中央统筹，地方各尽所能。原因在于，我们发现有的地区发放补贴确实提振了消费，但是较困难地区没有财力发放，就陷入了恶性循环。

**发放对象：**我们建议在发放时尽量对各地区、不同收入家庭做到一视同仁，甚至应该由中央统筹向生活更困难的地区和家庭倾斜，包括顺序优先和力度加大。

**发放内容：**我们建议同时发放消费券和现金，和香港模式类似。因为民众口袋里有钱才可以消费。由于疫情已经进入第三年，很多人的储蓄已经消耗殆尽，没有钱，再怎么刺激，人们也不会消费。所以此时应尽量考虑发放一些现金，才能

够起到更好的撬动效果，并让消费券真正发挥作用。

**目标行业：**对于消费券要重点刺激的行业，我们认为应针对民生关键行业，特别是基本生活用品领域，如此才能保证最基本的生活状态。对这些领域可以考虑发放小额、有效期短、使用灵活的消费券。

**发放方式：**可以考虑与现有数字平台合作，以减少发放成本，也可以考虑与数字钱包挂钩。在具体使用中可让现金发放和消费券使用做一定捆绑，最大程度地把发放的资金在一定时间内转化为消费。如果有些人没有数字能力怎么办？也可以考虑借助社保的个人账户体系，往绑定的账户发放资金。2021 年底，全国持有社保卡的人数已经达到 13.35 亿，是总人口的 95%，所以即便是贫困地区，这样的发放方式也可行。

**资金来源：**钱从哪里来？建议通过多种渠道筹集，特别是可以考虑发行抗疫特别国债。2020 年末中央国债余额是 20.9 万亿，地方政府债务余额 25.7 万亿，即便将各种各样的隐形债务都加进来，我国政府债务占 GDP 的比重目前在全球仍处于低位，因此存在发债空间。并且，中国赤字率目前也相对较低。鉴于今年大量基建项目可能会因疫情而延迟，所以也可以考虑在不改变投资盘子的前提下，先调拨资金用来发放补贴，将来可以根据进度再把这部分投资资金安排到下一个财政年度。只要消费能够提振起来，中小微企业活过来，其他事情就好办。

**信息透明：**最后一点是信息透明，要在发放之前做好设计，发放之后做好监测，加大全流程的监督，能够让发放的资金尽快地、尽可能公平全面地发到老百姓手中，并真正消费起来，起到挽救困难老百姓生活、续航中小微企业和提振经济的多重作用。



## 失业人群与困难家庭需要直接的社会救助<sup>5</sup>

张丹丹

教育部长江青年学者、北大博雅青年学者、国发院经济学长聘副教授

### 失业数据让人忧心

国家统计局近日发布的数据显示，2022年4月，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6.1%，其中16-24岁人口调查失业率高达18.2%，外来农业户籍人口调查失业率为6.6%。这些数据引发了社会的广泛关注。

2021年，新冠疫情升级为奥密克戎病毒，并在全球大暴发。此后，我国的整体失业率持续上升。即便排除掉季节等因素，上升趋势仍十分非常明显。4月的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6.1%，而2020年武汉疫情爆发后的失业率为6.2%，而2020年当时是全国一盘棋从严防疫，当下多点散发和个别城市，但失业率几乎在同一水平。

尤其引人注目的是青年群体的失业率已经超过欧美国家同期水平。4月，我国16-24岁人口调查失业率为18.2%，远远高于同期欧洲和美国青年群体失业率的13.9%和8.6%。

值得强调的是，青年群体失业率高可能引发一些社会安定问题，比如犯罪。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外来农业户籍人口调查失业率在4月达到6.6%，也高于全国平均失业率水平。这是国家统计局首次发布有关青年群体和外来农业户籍人口的调查失业率，可见当前整

体就业形势并不容乐观，政府对上述两个群体的失业问题尤其关注。

### 中国与欧美抗疫侧重点不同

失业率上升的原因很多，主要是受疫情影响，同时严格的防控政策要求加大物理隔离、缩减经济活动也是主因之一。跨国比较来看，不同国家的疫情防控措施存在较大差异。

我国一直坚持“严防严控、“动态清零”的政策，而欧美国家的疫情防控措施则相对松散。不同国家的防控措施背后隐含的政策逻辑不同，比如中国以确保人民群众的健康为首要任务，欧美国家则以保经济为政策重点。

自2020年全球新冠疫情暴发以来，各国经济明显放缓。欧美国家由于早期防疫失利，既承受了巨大的经济损失，也蒙受了不小的健康损失。全球GDP增速在2020年下降5%，其中发达国家下降幅度达到7%（World Bank, 2020），OECD国家GDP下降幅度为6%-12%（OECD, 2020）。

美国2020年的GDP增长率为-2.3%，为1946年以来的经济最差表现，在2021年反弹至5.7%。

5. 本文根据张丹丹在2022年6月8日北大国发院第61期中国经济观察报告会（CEO）上的演讲整理。

欧洲国家中，英国 2020 年的 GDP 增长为 -9.8%，创下自 1709 年以来的最大降幅，而意大利为 -9.1%，德国为 -5.0%。

2020 年，中国采取了严格而有效的防疫措施，经济复苏较快，GDP 增长为 2.2%，是当年全世界主要经济体中唯一实现经济正增长的国家。2021 年，中国的 GDP 增长达到 8.1%。但 2022 年，中国再次遭遇奥密克戎疫情反复，从严防控使经济在上半年再次承压。

尽管公众健康受损较大，经济整体走势也不强，但欧美国家的失业状况相对乐观。美国失业率在 2020 年 4 月一度飙升至 15%，之后在社会救助措施下，迅速下降至 6%，并于 2021 年底下降至 4%。截至目前，美国失业率持续保持在 4% 左右，相当于新冠疫情之前 2019 年的水平，并且比大多数国家的失业率都低。

欧盟国家的失业率基数比较高，2017 年曾超过 7%，2019 略降为 6%，但 2020 年疫情严重时期也仅仅达到 6.27%，并没有显著升高。同时，欧洲的非经济活动人口（即退出劳动力市场的就业者）并没有增加，说明欧洲的失业率保持稳定并不是以劳动力大量退出为代价的。

中国防疫取得非凡的成就，经济增长也很有韧性，但失业状况不容乐观，给定我国的失业率一直走低，疫情期间失业率的变动相比美国和欧盟国家显得更严重。

除了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失业率数据，我们还有其它数据佐证。2020 年，北大国发院和腾讯智库曾合作基于微信用户的“从业人员追踪调查”，对 6000 多名在 2019 年底有工作的从业人员在 2020 年进行就业情况追踪调查。结果发现，同一人群在 2020 年 3 月、6 月和 11 月的失业率比国家统计局同期公布的数据更高，统计存在差异的主要原因是统计局在统计城镇失业率的时候，把那些因为疫情期间的防疫要求不能去工作的人都算成退出劳动力市场的人，而且，如果有人离开城市回到农村，也不算在城市找工作的人当中。

这显然是大大低估了疫情期间的失业率。

依据我们的调查数据进行测算，2020 年全国有 12% 的从业人员经历过失业。按 2019 年末全国就业人员 77471 万人计算，2020 年全国失业人数达 9265.5 万人。从失业程度来看，失业者平均失业 4 个半月，这些失业者中又有 1/4 的人失业期超过半年。

由于 2022 年 4 月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最新失业率数据再次与 2020 年 2 月处于同样高位，创出阶段性高峰，因此失业问题再次引发广泛的关注。

## 劳动力市场短期救助政策

中国与欧美在新冠疫情期间的经济增长与失业率存在反差，源于不同国家所实施的劳动力市场短期救助政策存在差异。

2020 年 3 月 1 日至 9 月 30 日，英国实施了“新冠带薪长假计划（CoronaVirus Job Retention Scheme）”，允许工人带薪休假，休假期间最高可领原工资的 80%。为使企业不裁员、保就业，政府支付工人休假期间的全部薪水。该项政策覆盖了全英 1170 万个工作岗位，总耗资 700 亿英镑。政府平均为每个岗位支付了 4.5 万人民币。2020 年 4 月，在英国首轮疫情最严重时期，该项政策覆盖了全英 19.2% 的劳动力，有效避免了大规模的失业危机。与此同时，英国进一步扩大了失业保障的申请范围，共计两百万人由此获益。除英国外，欧元区其他国家也实行了类似的大规模就业辅助计划。

2020 年，美国政府为小微企业发放了 3500 亿美元的就业补贴，鼓励其尽量不要解雇员工。由此，数以万计的小微企业员工享受了无薪长假，并保留了医保，同时还可以申领失业补助。此外，美国政府还临时增加了 2 万亿美元的失业保障金。2021 年，拜登政府实施了“2021 年美国拯救计划法案（The American Rescue Plan Act）”。



该法案规定,联邦最低工资增加为每小时 15 美元;对年收入 7.5 万美元以下的美国家庭直接发放现金补贴;将针对小微企业的联邦失业保障金增加到 400 美元或更高;将针对失业者的“疫情失业辅助计划”同时用于救助自雇经营者和灵活就业者。

我国的疫情专项救助政策侧重于“供给侧”,即市场主体,而不是个人。救助主要是为疫情冲击的企业“减税降费”,减轻企业成本,降低其倒闭和亏损的风险。

从新冠疫情首轮暴发到目前为止,我国仍缺乏针对个体的普惠性社会救助措施。基于北大国发院 2020 年的从业人员追踪调查数据,13% 的失业者获得了单位提供的部分工资。从社会救助情况来看,88.2% 的失业者没有得到任何形式的社会直接救助,失业保险覆盖的人群也仅为 7.7%,最低生活保障救助的人群仅占 1.4%。

综上所述,由于中国和欧美国家实施的是不同方式的救助政策,背后的救助逻辑不同,因此不同领域的表现差异巨大。欧美国家由于疫情防控不力,健康和经济双双受损严重,但注重对个体劳动者的保护和社会直接救助,弱化了经济

下行对个体和家庭的冲击。中国坚持从严防控疫情,健康保护较好,经济总体增长也表现出较强的韧性,但缺少对个体和家庭的劳动保护和社会直接救助。

就业不仅直接关系到消费和经济增长,还对社会稳定和社会福利有重要影响,因为人的工作状况恶化会显著导致心理健康出现问题,引发焦虑和抑郁情绪,最终导致社会不稳定的风险明显增加,社会福利整体下降。

## 政策建议

我国的疫情专项政策关注企业较多,虽然“减税降费”政策具有一定的普惠性,但无法覆盖到已经失业的群体,应认真考虑增加对个体和家户层面的社会直接救助措施。尤其是要考虑到公共卫生危机接连反复,已经持续两年半,失业个人和家庭的储蓄已经消耗不少,与 2020 年的情况已经大不相同,建议对长期失业者和返贫家户进行分层分类的直接救助,提升个体劳动力的获得感和社会整体的福利水平,这也是保民生、保社会稳定的关键一环。



## 我国就业形势再探讨<sup>6</sup>

卢锋

北大国发院金光讲席教授

在去年12月北大国发院第六届国家发展论坛活动上讨论了当时宏观经济和就业复苏的关系，最近半年宏观经济、劳动力市场与就业形势又出现一些新情况，借此机会从三个角度对这个题目做进一步观察探讨：一是我国城镇失业率特别是青年失业率的最新动向，二是我国“奥肯关系”已发展转型的经验证据，三是近年我国净增城镇就业持续下降情况。

### 近来就业压力加大尤其是青年就业矛盾突出

今年2-3月以来上海、深圳和北京等地疫情形势变化对宏观形势带来新的下行压力，部分宏观经济月度数据明显走低。如4月份工业增加值、房地产累计投资和消费品零售等指标都已出现显著负增长，特别是消费同比增速下降11.1%。

由于超大城市对城镇就业影响更敏感，劳动力市场数据反应较大。看城镇调查失业率，在2020年初疫情较快得到控制后，从2月6.2%一路回落到2021年3季度末4.9%；然而随宏观经济下行压力再次形成而触底回升，受最近疫情形势拖累今年4月增长到6.1%，5月才小幅回落到5.9%。31个大城市调查失业率4月飙升到6.7%，超过2013年该指标公布以来5.9%峰值。新增城镇就业数变弱，4月较大幅低于

2021和2019年同期，与2020年同期差不多。

新一波就业形势紧张突出表现为青年就业压力加剧。统计局数据显示，16-24岁的青年求职者失业率快速飙升，从去年底约14%上升到今年3月16%，4月大幅跳升到18.2%，创造了2018年1月该指标公布以来最高记录。5月份青年失业率小幅升高到18.4%。我国失业率指标通常低于美国与欧盟水平，目前青年失业率不同程度高于美国与欧盟水平，城镇失业率也暂时显著高于美国。

用同期青年失业率除以整体失业率可得这一比率指标，由于青年劳动力市场结构特点该指标一般是大于1的倍数。从2018年以来数据看，该倍数在波动中趋势上升，去年下半年到今年大约在3上下，显著高于2018年所处的2.0-2.5区间。可见青年群体不仅由于其结构性特点相对整个劳动力面临较高就业压力，而且近年这个压力较高幅度在波动中趋于上升。CIER就业市场景气指数整体值与高校毕业生分项值的差距也提示这一点：2018年初所有求职者和高校毕业生景气指数分别为1.91和1.74，二者差值只有0.17。今年1季度上述指标值分别为1.56和0.71，差值扩大到1左右，也说明青年就业压力相对较大提升。

6. 本文根据卢锋在2022年6月8日北大国发院第61期中国经济观察报告会（CEO）上的演讲整理。



青年失业率上升与多方面因素有关。原因之一一是高校毕业生人数较快扩大带来较高学历劳动供给和较高质量岗位需求大幅增长。我国 16-24 岁青年求职群体绝大部分是各类学校毕业生，今年高校毕业生 1076 万相当于 20 年前十倍左右，比去年增长 167 万增幅达 18%。这代表劳动者平均受教育年限增长和素质改进，体现大学多年扩招积极成效，同时也意味着劳动供给或岗位需求在毕业季前后密集增加，对青年就业造成“泄洪效应”压力。高校毕业生群体对就业岗位种类和质量需求变化，也会对就业岗位供给匹配带来新的压力。

最近就业形势受到宏观经济景气度变化以及部分行业和地区经济运行状态影响。去年上半年经济强势复苏推动就业好转，高校毕业生秋招时总体形势良好，不过少数行业因政策环境变化招聘需求下降已对相关领域就业带来影响。今年 2-3 月后部分城市和地区疫情形势出现反复，拖累 3-5 月部分经济指标再次走低甚至负增长，上海、深圳、北京等超大城市在吸纳高校毕业生就业方面占据特殊地位，其疫情形势变化加剧了本已存在的青年就业压力。

从去年底前程无忧发布《2022 届毕业生秋招行情》看，今年高校应届毕业生秋季招聘形势总体好于前两年，应届毕业生招聘需求最多的 15 个行业中，11 个在 2021 年秋招时需求量都超过前两年。不过数据显示房地产开发、教育/培训、电子商务、电信/网络设备等招聘人数下降，前两个行业降幅较大与政策环境变化带来调整压力有关。京、沪、广、深是高校毕业生招聘需求规模和强度最大城市，今年 2-3 月后这几个城市先后经历疫情冲击，其它省区也不同程度受疫情影响，成为 4 月青年失业率跳升的关键原因。今年 4 月 27 日智联招聘发布《2022 大学生就业力调研报告》，调研时间为 3 月中旬至 4 月中旬，显示应届高校毕业生就业形势出现不利变化：应届高校毕业生中选择自由职业和慢就业比例均较去年提高 3 个百分点，其平均期望月薪 6295 元比

去年 6711 元下降约 6%。

另外一个可能长期影响我国劳动力供求特别是青年就业形势的因素，是新生代农村户籍青年求职者，不再具有早先农民工在农业与非农两类工种间切换的行为特征，或者说以 Z 时代年轻人为主体的青年就业群体总体已“去农民工化”。这一变化本身是我国经济发展和时代进步的积极表现，不过在面临阶段性工作岗位供给不足环境下，也会增加供求关系调整刚性与增加就业压力。由于上述多重因素叠加交织，目前青年就业形势或许处于进入新世纪以来相当复杂棘手的局面。

## 我国奥肯关系变型显示宏观波动影响就业机制改变

改革后我国失业率两次峰值，主要与知青回城和国企改革伴随较大规模员工下岗有关，与宏观经济周期涨落关联性较弱，使得经济学“奥肯模型”经验规律在我国“水土不服”。当然这不等于说转型背景下我国劳动力市场与就业形势对宏观经济波动没有反应，观察显示，改革时期农业劳动力转移规模相对变动与宏观波动存在密切联系，因而要引入劳动力转移增量形成广义奥肯模型来研究中国转型期奥肯关系。

对 1980-2012 年数据分析的结果显示，我国当时奥肯关系估计方程中，官方失业率统计指标以及包括下岗职工在内等多种估计指标，都与宏观经济波动没有显著统计联系，农民工转移年增量等指标则有稳定和显著的联系。这个经济现象的制度条件显然是计划时代二元城乡壁垒对劳动市场区隔效应改革初期仍在发挥作用，其行为基础则是第一代农民工两种职业身份实际发生的不定期切换。我国经济最初 30 年宏观涨落所派生就业冲击主要由农民工群体吸收消化，是农民群体为经济运行稳定所做的特殊贡献。

去年 12 月的 NSD 国家发展论坛上，我们考察疫情期间宏观经济波动环境下劳动力市场情况

时，提出失业率和农民工转移这两个变量都对宏观经济波动做出了明显的合乎规律的反应，提到我国奥肯关系可能已发生了阶段性变化。不过当时侧重讨论就业与宏观经济复苏不充分之间相互制约关系，没有对我国奥肯关系转型问题本身做更多考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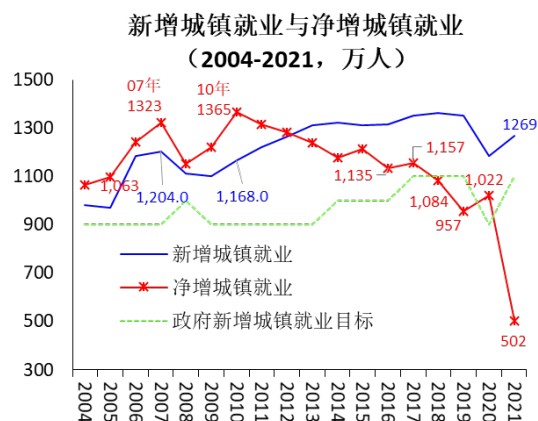
观察新时期经济高质量发展阶段特点，一些长期演变趋势会改变我国劳动力市场对宏观经济波动的响应方式和机制。最重要的是持续改革提升城镇劳动力市场整合性和灵活性，重塑早先奥肯关系的体制条件。如逐步破除早先城乡二元体制壁垒；除少数超、特、大城市外，中小城市普遍放开早先进城落严格管制条件，允许和鼓励农民大规模转变成为市民；非户籍以及农村户籍从业人员在城镇劳动力市场所受歧视性待遇减少等。

农业劳动力转移随着经济发展进入较高阶段也发生显著变化。从数量上看，随着农业劳动力占劳动力总量比例持续下降，农民工转移总量逐步趋近峰值，年度增量从新世纪初年 1000 多万下降到疫情前两年的 200 万上下。同时非城市户籍青年求职者不再具有早先“农民工”行为特点，他们在城市就业形势困难时大规模回流原籍乡村务农的主观意愿与现实可能都已实质性改变，塑造原先奥肯关系的主体行为基础发生变化。

另外，官方有关劳动就业重要统计指标改进对上述问题提供了新的可能。新设调查失业率指标较好体现了失业实际情况及其对宏观波动反应，农民工数据定期调查发布为观察劳动力市场变动提供便利，相关指标月度和季度较高频数据发布为超越早先只能用年度数据估计奥肯关系的限制提供可能。在目前数据条件下，我们利用城镇调查失业率和农民工转移数据，分别估计了起自 2017 年（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数据）和 2013 年（31 个大城市调查失业率数据）到 2021 年底方程，结果显示农业劳动力转移与调查失业率变量都对宏观经济具有显著反应，说明一段时期以来我国劳动力市场对宏观经济波动响应方式已发生阶段性变化。

## 城镇净增就业持续减少折射劳动力市场结构性变化

观察劳动力市场需关注我国城镇净增就业变动的一些特点。下图显示 2004 年以来每年新增城镇就业、净增城镇就业以及政府对新增城镇就业指导性调控目标值，其中几点情况引人注目。2010 年以后十余年，净增城镇就业除三个年份小幅回升外其余都在下降，持续下降的趋势特征明显。尤其是 2021 城镇净增就业从 2000 年的 1022 万大幅下跌到 502 万，从数据看跌幅一半以上，异常性不言而喻。另外 2004-2012 年曾持续出现净增城镇就业人数高于新增城镇就业，也是一个令人费解的现象。我们做了一些探讨，有的疑惑尚未得到解释，这里分享两点初步看法。



我国目前有三个城镇就业统计指标。一是“城镇累计新就业人员”，指各类市场主体和其它机构在特定统计时期内创造的所有城镇就业加总，该指标存在较多重复计数问题，数据没有公开发布。二是“城镇新增就业人员”，定义为城镇累计新就业人员减去退休、死亡等自然减员人数，这是官方就业政策重视的目标调控指标之一，其调查数据常规发布。三是“城镇净增就业人员”，就逻辑关系而言它应是新增就业的一部分，不过其数据获取并非来自直接统计调查，而是在统计部门公布的历年全国就业人数基础上，把相邻两年数据相减而得到。获得数据方式不同，使得城镇净增就业小于新增就业的一般逻辑关系不一定



总能实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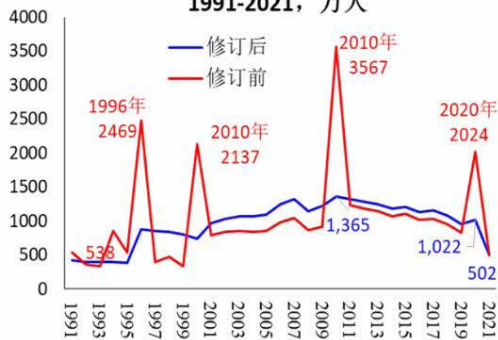
下面左图显示城镇净增就业大于新增就业现象，可能与统计部门用普查年份获得的较高总就业人数对非普查年份数据调整有关。通常年份就业总人数通过抽样调查得到，从过去几次普查年份数据倒推可知，非普查年份就业人数或有不同程度低估，结果在普查年份或统计方法改变的1996年，净增就业人数屡试不爽地出现陡直上升的尖峰现象（下面左图），提示这些年份总就业人数统计值出现较大幅度跳升。把普查和统计方法调整年份较高就业人数统计值分配到两次普查期间其它年份，导致调整后城镇就业整体水平和净增就业人数增加。另一方面，由人社部门统计的历年城镇新增就业不存在上述普查数据跳升问题，导致城镇净增就业上升并大于城镇新增就业的看似矛盾现象。下面右图显示，把未调整的城镇净增就业与城镇新增就业人数比较，净增大于新增的矛盾关系便不复存在。

再看城镇净增就业绝对人数及其相对新增就业人数的持续下降，应该主要与以下几方面因素有关。一是随着人口结构变化，新进入城镇劳动力统计对象（城镇户籍与农村户籍）的人数减少。二是现有就业人员由于退休和意外去世发生退出，会同时导致城镇新增和净增就业人数减少，但是如果没有到退休年龄人员退出劳动力队伍或者回到农村，从统计角度可能导致净增相对新增的减少。三是非青年年龄段的农业劳动力从农村转移到城市的人口减少。

2019年国盛证券杨业伟博士与其同事在一份研究报告中，对我国2011-2021年期间历年的城镇劳动力市场“新进入量”、“退出量”、“新转移进入量”进行估计，这三个指标大体对应上述三类导致城镇净增就业人数绝对和相对下降趋势的因素，或可理解为对城镇净增就业需求的分解因素估测。该报告汇总三种变动形成的净结果，过去十余年也是在波动中呈现下降趋势，并且在2021年出现较大降幅下降，与上述城镇净增就业人数动态比较接近。

从上面讨论看，城镇净增就业减少并不必然等于现实就业压力同比例加大，因为净增就业需求也在减少，而需求减少原因则是上述三方面情况。这意味着农业劳动力转移速度放缓，也意味着城镇化推进速度放缓。目前农业劳动力占中国劳动力比例已大幅度减少，2020年七普时已降到23.6，放缓可能符合客观规律。不过我国目前城乡劳动生产率仍有相当大差距，如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差距虽多年下降近年仍在2.5倍之数，劳动力转移减速过大对潜在产出增长会有边际牵制作用。农业劳动力转移一直是长期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因素之一，未来政策仍需兼顾农业发展、乡村振兴与国民经济较快成长之间关系。

修订前后的净增城镇就业人员  
1991-2021, 万人



修订前净增城镇就业与新增城镇就业  
(2004-2021, 万人)





## 对话 | 提振中国经济：复杂性、紧要与策略性<sup>7</sup>

黄益平

北大国发院副院长、数字金融研究中心主任

刘国恩

北大国发院教授、北大全球健康发展研究院院长、中国卫生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卢锋

北大国发院金光讲席教授

沈艳

北大国发院经济学教授、北大数字金融研究中心副主任、教育部 - 北京大学人力资本与国家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

张丹丹

教育部长江青年学者、北大博雅青年学者、国发院经济学长聘副教授

赵波

北大国发院经济学长聘副教授

黄卓

北大国发院助理院长、长聘副教授、数字金融研究中心副主任

黄卓：首先想问黄益平老师，目前中小微企业和个人面临的困难很大，这关系到经济发展和民生，对于这两个群体的帮扶您有哪些具体建议？

黄益平：我们政府从2020年以来一直为中小微企业提供支持，“保经济主体”其实就是保中小微企业。主要做法是提供银行信贷。2020年，中小企业信贷增长30%，2021年增长25%。经济不好，但贷款增长很多，说明这项政策很成功。下一步，金融机构还要继续通过信贷帮扶有需要的中小企业。

但同时我们也要意识到，现在民企的资产负

债率已经超过国企，经济不好时，民企还本付息的压力非常大。所以我认为，除了财政方面现在减税降费、降低成本的措施，金融机构、央行或是财政是否可以考虑更多地提供如贴息或暂缓付息的支持。民营企业现在面临的最大的挑战就是现金流压力非常大，我们应该从多方面缓解这种压力，让民营企业先活下去。

黄卓：从世界银行最近的报告来看，全球经济现在正进入增长乏力和通胀高起的时期。全球通胀给我国带来的压力有多大？我们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该怎样应对？

7. 本文根据2022年6月8日北大国发院第61期中国经济观察报告会（CEO）上的学者对话整理。





黄益平：输入型通胀的压力非常高，尤其是俄乌冲突以后，全球通胀进一步提升。对我国也有压力，4月份CPI已经比前几个月上涨很多，达到2.1%，通胀压力在抬头。

但总体上，我国过去一年多所面临的生产者价格指数很高、投入品价格很高，消费品价格相对较疲软的格局可能还会持续一段时间。原因在于，从消费品供求角度来说，我们的供给比较稳定，需求非常疲软。所以从供求关系看，压力不是特别大，只是略有上升。这种情况对我们的经济复苏仍然会造成非常大的压力，尤其是对中小微企业处于制造业中下游，其投入品变得越来越贵，但产品价格上不去，使利润空间受到明显挤压，不利于复苏。

所以，我最担心的不是通胀抬头，而是中小微企业的利润空间被明显挤压，再加上前面说的还本付息压力大幅上升。通胀当然需要关注，但目前不是主要问题。

黄卓：请问赵波老师，我国房地产调控政策出现了一些松动，现在还是在坚持“房住不炒”的大前提下因城施策。房地产市场有三大主体——地产商、地方政府、个人购房者。目前，地方政府的积极性较为明显，地产企业和个人购房者的信心和积极性怎么调动？

赵波：目前的政策从信贷总量上对房贷有很强的控制，在这个大前提下，有针对性地降低利率能让一些人获益，但对于整体的刺激性不如想象的那么大。

如果想进一步提高开发商和老百姓的积极性，可能还需要更强的刺激。比如推迟“三条红线”落实的最终期限，避免长期政策的短期化。呼吁有关政策进一步放松。

黄卓：对于普通老百姓，现在的时点是不是一个比较好的购房时机？应该等待哪些信号出现时下手？

赵波：经济对于不同人群的影响不同，低收入

人群目前最担心的肯定还是生计问题，而对于工作相对稳定并且住房是刚需的家庭而言，我认为现在是比较好的购房时机。因为名义利率在下降，通胀在上升，真实利率在下降，所以购房者的利息负担会减少。

事实上，现在的房贷利率是过去五六年内相对较低的水平。目前对于首套房购房者有比较好的利率优惠政策，但对于改善型购房者，优惠幅度不太大。由于购买改善型住房的同时也会释放出部分二手住房供给，会增加整个房产交易的流动性，所以也需要相关政策配套。

黄卓：沈艳老师呼吁要对家庭发放现金补贴和消费券，实际上在2020年疫情暴发时您就提出要发放消费券，并对一些试点做了效果评估。如果评估认为效果比较好，为什么国内发放消费券的地区并不是特别多？这一举措的关键点是什么？

沈艳：第一，2020年的武汉封城相对属于短期。我们在评估中看到，其实在封城最严重的2020年3月份之后，经济本身就已经开始逐渐反弹，所以当时消费券发放对反弹过程起到了助力作用。

第二，消费券原本就应该只是一个短期刺激，不宜长期大规模操作。打个比方，汽车如果发动不起来，和别的车接一下电就可以发动起来，然后自行运转。

今年我们再提发放生活补贴，包括现金和消费券，因为此时的状况和2020年有很大区别，疫情已经进入第三年，不少家庭的储蓄已经消耗殆尽，所以现在恐怕现金和消费券共同发放才能够更明显地达到刺激效果。2020年的消费券有用，只不过当时的经济在疫情得到控制之后就可以自行持续，所以不需要继续大规模操作。我们对现在消费券的定位也只是一个刺激，就像汽车接电打火，帮助消费重振，并非长期性安排。

黄卓：除了现金补贴和消费券，是否可以考虑增加或放松关于消费贷款？

**沈艳：**这些措施都可以考虑，只是我目前认为，如果中小微企业本身状况已经不是很好，即使获得大量贷款，将来还要付息。

消费也有类似问题，消费贷款能够起到较好作用的前提是居民有相对比较稳定的收入。我前段时间看到一个数据，一些人以前有多张信用卡互相转换还款，但现在资金链断裂，导致还款全面大幅度逾期。所以，只有在收入稳定的前提下，才能考虑消费贷款的发放。

另外，从银行的角度也需要商业的可持续。最好能在数字技术的帮助下提升风控水平，使银行能够识别出那些确实有还款能力的优质个人，去增发贷款，帮助其跨期提前消费。

**黄卓：**张丹丹老师比较了疫情期间中国和欧美国家社会救助的不同做法。欧美较多的是直接救助政策，比如对家庭发放收入补贴，或是直接给企业提供保就业的政策。欧美在发钱对象和额度选择上，主要采取什么标准？积极性和副作用有哪些？

**张丹丹：**基于我的了解，以英国的带薪假为例，该政策在执行时并不是所有岗位都一视同仁，而是主要覆盖服务行业和低收入群体。对餐饮业、旅游业等服务型行业，由于其在短期封城期间的收入损失无法得到后续消费的弥补，因此得到更多救助。总的来说，英国在补贴对象选择上倾向于覆盖那些比较脆弱的部门和群体。英国经历了几次封城，该政策的推行时点是在每一次封控开始之时，将更多的从业者纳入到救助范围内。其救助资金是分配给用人单位而非个人，由雇主分发到雇员手中，最高补贴的金额可达到员工工资的80%。

对于中国来说，要做到1/5的岗位补贴平均1年半4.5万人民币的薪水是比较困难的，但我们可以借助大数据，获取一些个体就业信息，制定一些分层的救助措施。这应该是有可能做到的。

欧美救助政策的积极作用是保就业。英国的措施保证了86%的就业能够完全没有变化。另

外一个作用是保持了民众的良好心态。研究发现，英国人在带薪长假中的心理健康状态和工作时没有区别。相比中国只有13%的失业人口有工资可领，收入的大幅度下降，使得失业群体的心态整体下降。工资补贴能弥补一部分的心理损失，但由于我国失业人群的就业意愿非常强，更想尽快复工，在工资补贴数量少的情况下，无法完全弥补失业带来的焦虑。

对于欧美救助政策的批评主要有两点：第一是减少了市场对企业的优胜劣汰作用，较难淘汰竞争性差的企业；第二是缺乏对个体自谋出路的激励。

**黄卓：**卢锋老师有过分析，美国和欧洲国家青少年群体的失业率曾经一度特别高，但2020年之后明显下降。他们是如何解决这些问题的？中国现在的青年失业率也很高，今年又有约1000万毕业生要进入市场，对他们可以有哪些就业帮扶措施？

**卢锋：**印象中疫情前欧盟多年平均失业大概在9%左右，但其不同成员国之间失业率差别很大，比如德国和意大利有相当大差别。不同时点的差别也特别大，比如欧债危机爆发后失业率显著上升，欧盟有的国家失业率超过两位数，青年失业率超过20%，个别国家甚至达到30%。发展中国家差别更大，印象中有的非洲国家整体失业率达到25%上下。

目前美欧失业率处于较低水平，重要原因在于疫情后实施大规模刺激政策，宏观经济处于景气度较高阶段。美国在金融危机后实施了当时空前规模的刺激措施，财政与货币政策分别于2010和2017年退出。疫情危机下接二连三采取了更大规模的刺激政策，特别是拜登政府上任后在经济已经强劲复苏后仍追加大规模刺激措施。美欧一直担心经济增速过低，美国学界还有长期停滞讨论，所以非常在意经济增长，政策意图上尽量把增长保持在最高可能水平。回头看，这次明显搞过了头，导致几十年未见的严重通货膨胀。



救助刺激政策一定阶段支撑宏观经济快速复苏，使得失业率目前处于较低水平。另外失业率与劳动参与率有关，美欧劳动参与率多年在波动中趋势性降低，反映一些适龄劳动人口由于种种原因退出了统计意义上的劳动者群体，也会导致失业率相应走低。

关于青年就业和毕业生就业的问题。今年新进入职场的一千多万人有一大半是高校毕业生，还有几百万是中专毕业生，很大程度上青年就业就是毕业生就业，因而青年失业率变动与毕业生求职时间节奏联系有较显著的季节性。高校毕业生代表劳动者平均受教育年限增长，从长期看是积极的变化，但是短期意味着劳动供给或岗位需求密集增加，也会对青年就业带来压力。

从经济学规律看，就业形势与宏观经济特定时点表现存在客观联系。宏观经济不好，就业很难好，所以稳增长也就是稳就业。由于疫情冲击等方面原因，近年经济增长总体低于潜在增速。去年底经济面临三重下行压力，政府实施稳增长调控政策，今年初收到初步成效。但是在局部疫情冲击下，近来部分经济指标再次回落甚至负增长，青年就业压力随之上升。

另外，青年就业困难背后显然有结构性制约因素。例如由于历史原因，1962年我国出生人口额外增长一千多万，其中一部分今年到60岁退休应该离开工作岗位。按道理劳动力市场供给增加应该有助于缓解失业率，去年底有观点认为今年劳动力市场可能面临供大于求矛盾也有一定道理。当然就这个因素来说，也要考虑1962年增加出生人口未必都在今年退休，可能前几年已经退休，当然也有一些人过早离世等因素。此外还有一点，就是这些人退出的岗位能否比较平顺地被青年填补，这就涉及到劳动力市场中的摩擦和匹配问题：比如60岁人退休，空出的职位或许是看仓库，不一定直接由年轻人填补；或者空出的是高级管理工作岗位，年轻人也没法顶上。退出工作岗位要通过不同年龄和经历从业人员依次传导，最终才能成为青年求职者可现实选择的岗位，这个过程是否顺利通畅取决于很多摩擦因素。从目前青年就业至少短期困难加剧情况看，其它不利因素显然超过了退休增加因素影响。

目前青年就业困难既有短期原因，也有中长期结构性因素根源。讨论这个问题倒是呼应了今天报告会所谓复杂性和紧要性的主题，化解这个问题需短期措施与中长期政策配合应对。



## 中国经济的重大新挑战与应对<sup>8</sup>

林毅夫

北大国发院名誉院长、南南学院院长、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院长

作为《中国与西方》一书的主编之一，很高兴参加今天关于“全球经济的新观察、思辨与应对”主题研讨，并就中国经济的重大新挑战与应对谈谈我的看法。

近几年以来，我在各种场合反反复复地讲，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保持快速发展是我国驾驭大变局的基础和关键，是我国最大的大局、最大的政治。

同时，我也反反复复地讲，中国到2035年以前还有每年8%的增长潜力，面对困难，只要利用好国内的各种有利条件，应该可以实现每年6%左右的增长。并且从2036年到本世纪中叶，我国每年应该还有6%的增长潜力。同样，只要利用好我国有利的条件，应该可以实现每年4%左右的增长。这样，到2049年建国一百周年时，我国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的人均GDP应该可以达到美国的50%，经济总体规模可以达到美国的两倍。到那时，世界将会出现一个新的稳定格局。

很高兴我的上述看法在国内外引起不少关注，也得到不少肯定和赞同。上述是我对中国经济中长期发展的看法。

今天，要重点谈的是中国经济当前的重大新挑战，以及怎么应对这些挑战。

### 当前经济面临国内国外双重新挑战

对于新挑战，我从国外和国内两个方面讲。

先说国外，美国总统拜登2021年上台以后，相比特朗普时的对华政策而言，换汤不换药，延续了贸易战、科技战，而且变本加厉积极推动组建所谓的民主同盟，以政治体制、价值观、意识形态等划界，试图以此在政治上孤立中国，进而经济上让这些国家和中国脱钩。

最新的行动则包括美、日、印、澳组成一个联盟，想打造亚洲版的北约，美国主导的北约则

8. 本文根据林毅夫在2022年5月18日北大国发院第2期“承泽论坛”上的演讲整理。





邀请了日本、韩国这些西太平洋的国家去参加他们的峰会。就在上周，拜登还在华盛顿举行东盟国家特别峰会，推动美国与东盟国家签署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并试图说服这些国家把供应链搬离中国。

除了美国对中国发动的遏制和孤立行动之外，俄乌战争从今年2月底爆发到现在已经80多天，短期之内的影响很明显，造成全球的石油天然气价格、粮食价格急剧上涨。美国、欧洲本来已经面临通货膨胀的压力，俄乌战争进一步加剧了他们的通货膨胀。

对中国而言，我国不仅是石油的主要进口国，粮食也在相当程度上依靠进口。除了油价、粮价之外，还有一些进口的矿产资源价格也在上涨。因此，俄乌战争对我国进口成本会增加，影响经济增长，这在短期是不可避免的。

从中长期来讲，经过这次俄乌战争，俄罗斯与欧盟之间的不信任和安全局势的紧张一时间注定难以消除。有些势力试图浑水摸鱼，把中国和俄国绑在一起，挑拨中国和欧洲的政治关系，以安全为由，推动欧洲与我国在经济、贸易上脱钩。

以上是国际环境中出现的重大新挑战。

再说国内。从2021年第三季度以来，我国经济已经出现比较大的下滑，这一下滑趋势源于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的三重压力。实际上，从去年下半年到今天，还处于这样一个下滑周期当中。

进入到今年3月份以后，国内经济可谓雪上加霜，因为奥密克戎病毒的传染率非常高，一些地方，像深圳、广州、上海相继出现比较严重的爆发。为了从严防控病毒，实行动态清零，保护人民健康，上海从3月份以来基本上一直处于封控状态，同时，封控的城市还在增加，比如北京目前的防疫局势也呈现胶着。

疫情防控的举措必然影响到生产、投资、消费各个方面，使经济全面放缓，要实现今年5.5%

的增长目标将更加困难。

我们该怎么应对国内国外的这些新挑战？

## 保持增长和开放应对国际挑战

对来自国外的挑战而言，美国冀图各国跟中国脱钩，让中国重回封闭经济，如果得逞，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就会慢下来，中国的人均GDP达到美国的50%就不是2049、2050年，可能要延后很久，我们的第二个百年目标就难以如期实现。而且，夜长梦多，会滋生更多新的挑战，这正是美国的如意算盘。

不过，面对美国的这种图谋，我们也看到自己的有利条件，中国是世界第一大贸易国，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也已经是世界第一经济体，拥有世界第一大市场。贸易是双赢的，而且贸易当中的小经济体从中受益超过大经济体。美国也许为了维持其霸权地位，宁可为了政治利益牺牲经济利益，但是欧盟、东盟和其他经济体如果跟随美国和中国脱钩，需要牺牲掉自身的经济利益，在政治上他们只不过为美国维持霸权做嫁衣裳，得不偿失。

自2008年以来，中国每年为世界经济增长贡献在25%-30%之间，如果能保持这一贡献率，美国以外那些国家为了自身的就业、社会稳定和发展，不能没有中国市场，就不会轻易掉进美国的圈套，美国要其他国家和中国脱钩的图谋就难于实现，我国就会有更大的机会争取一个有利于自身发展的国际环境。

对于俄乌战争，我们也要继续坚持清晰坚定的国家立场，即我们希望和平，主张用外交解决争端，不愿意看到战争；我们坚决维护《联合国宪章》，尊重每个国家领土的完整。当然，我们也必须尊重各个国家的安全需求。我们和欧洲国家没有地缘政治的矛盾，要避免落入美国和海外有些势力的圈套，影响到我国和欧洲国家的经贸合作。



总之，除了美国为了维持政治霸权宁可牺牲经济利益之外，对其他国家而言，中国的增长、中国的开放、中国的发展正是他们的发展机遇。所以，保持快速增长、扩大开放、倡导全球化既是实现第二个百年目标、实现民族复兴的需要，也是破解美国图谋和外部挑战的最好办法。

## 重树信心，守住重心，化解国内经济的挑战

从国内的经济挑战来讲，我们从去年以来面临的三重压力——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我个人觉得最关键的是预期转弱，因为预期转弱以后，大家投资就没有信心，供给就会减少，供应链受到冲击，也失掉了克服困难的动力，进一步传导就会带来就业下降，收入不增长，最终需求也会收缩。

所以，三重压力中最关键的是预期转弱。

预期怎么转弱的呢？这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政策执行层面出了问题，去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指出了一些政策执行中的合成谬误。比如平台治理、双碳目标、房地产行业整治、共同富裕，每一项都是很重要和必要的改革、调控政策和发展方向，但在执行上，一些中长期的、全局性的政策被短期化、地方化、碎片化执行，形成了合成谬误，打击了大家对经济发展的信心，尤其是企业家和投资者的信心，而我们都知，信心比黄金更重要。

比如共同富裕，这是社会主义国家的长期目标，是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决定。但是这个目标提出来以后要做好配套的解释工作，不要产生劫富济贫的误读，影响企业家投资和长期发展的信心。共同富裕的政策需要先把蛋糕做大，由先富带动后富，并设计合理的税收政策鼓励一些富豪的慈善捐赠。结果这项属于长期目标的政策，解释工作做得不及时，不充分。

在平台治理、房地产行业整治时提出，同样出现了组合谬误，影响了企业家的信心。

和重树信心一样重要，是坚定经济发展这一重心。去年的经济工作会上再次强调，发展是解决一切问题的基础和关键；一定要把这项认识落实到位，在发展中解决国内国外的问题，否则只会使问题更多。

## 新冠疫情的防控是当前最紧急的挑战

以上是中长期都会存在的挑战。就当前来讲，最紧急的挑战是新冠疫情的防控。

在疫情防控上，动态清零的总方针是对的，但在落实上要做到科学、有效，不能在落实当中滥用权力，层层加码。我们在媒体上看到有些地方打着疫情防控需要静态管理的旗号，不让农民下地。农民在农田开放的空间工作，远离人群，奥密克戎传播不了。农业与工业不同，农时一误就是一年，这会影响到粮食安全，威胁社会稳定。所以，在落实防疫政策时一定要坚持科学的原则，开动脑筋，因地制宜，而不是层层加码。层层加码本质上是一种懒政的表现。

各地在争取动态清零以后，要速度恢复生产生活。由于疫情已经两年多，在一些封控城市，很多中小微企业已经到了濒临破产的边缘。在这种状况下，一定要出台有效的政策来共度难关，像减税、免税、减租金、贷款延期等等一系列措施，都是有必要的。企业要是倒闭，失业会增加，再要恢复起来就会困难重重。

同时，我们的救助也要关注个人和家庭，这两年受疫情冲击，有些家庭的积蓄已经用得差不多了，不管在线上或线下消费最近都出现崩塌式下跌。

针对这种情形，我和国发院的其他三位老师最近专门写了一个报告，建议在这些受封控的地方给每个家庭发1000块钱人民币，以支持他们



的消费。这 1000 块钱人民币中可以有 500 块钱是消费券，针对所在地的中小微企业以某些行业为主，消费券就支持家庭在那些行业的消费；另外 500 块可以采用人民币现金，尤其是数字人民币，这样也有利于我们推广数字人民币。

在上述救急措施之外，积极的财政、货币政策也要发力，包括支持新基建，为结构转型升级提供条件。

我相信如果能这样多方努力，假定疫情能够在 5 月底全国实现动态清零，今年保持 5.5% 左右的增长还是有可能的。

我们在增长速度上不能低于美国，这是我国经济工作应该有的一条底线。我们必须努力保持增长，这样可以加强信心，其他国家也会对我们有信心，这是对内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对外驾驭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最好办法。

## 企业越是艰难，越要把“触角”伸出去<sup>9</sup>

周其仁

北大博雅资深教授、国发院经济学教授

### 占领消费者心智，品牌影响力比产地更重要

现在大家都关心的大话题是中国世界工厂何去何从，前景在哪里？这是不管国际国内都关心的话题。我们再把题目缩小一点，佛山制造何去何从？佛山的民营企业何去何从？这是跟在座企业家有关系的。

改革开放以后，佛山制造的成就非常显著。但是把时间尺度往前拉，把历史看得远一点，其实中国制造早在古代就很厉害。虽说中国是以农立国，但是从今天全球市场竞争的角度来看，中国的农产品在世界上并不怎么有名。中国古时候在世界上有名的就是制造。China 就是瓷器的意思，还有海上、陆上丝绸之路，丝绸是非常具有独到性的工业制造产品，瓷器也是工业制造产品。

古代佛山就是中国天下四大聚之一、四大名镇之一，其他的还有苏州、汉口、景德镇等，苏州有丝绸业，汉口有冶铁业，景德镇做瓷器，佛山有广锅也有陶瓷，都是制造业。我曾经参观过南海一号沉船，一船全是 made in China 的工业制造品。

但是我们作为后人来看整个中国制造的历史，我们是有遗憾的。它不仅仅是在近代落伍。在近代没有落伍之前，回过头去看，我们留下什么了？

我们都知道佛山很厉害，这个地名很厉害，苏州很厉害，汉口很厉害，都是地名很厉害。但是有一家知名的商号吗？有一家知名的企业吗？有一家知名的品牌吗？

今天的消费者买一个苹果手机，会关心苹果手机在哪生产吗？会关心苹果公司在哪里注册的吗？有些人知道，但很多人不知道，不关心。我们买一件衣服，会关心它是哪个牌子，但是并不关心它到底是在哪里造的。

这件事情要引起关注，它会影响我们今天对制造业何去何从的理解。这不是我们供给方愿意这样，是消费者愿意这样，是市场买家愿意这样，客户愿意这样，这个潮流我们只有适应。

今天我们问中国瓷器哪个公司最厉害，可能很多人回答是景德镇，但是具体景德镇哪个公司，很难说得上来。我曾经和佛山企业家一起参观过荷兰代尔夫特皇家蓝瓷公司。这家公司一年就600万欧元的收入，我们去的企业家做的生意都比这大。但是参观完还是很有感触，虽然规模不大，但是传承了300多年，把产品销往全球各地，供给英国皇家、俄国克里姆林宫等重要场所，被用于许多国际外交重要场合。

我们整个中国制造历史，它到底缺在什么地方？也有很好的制造，当年也有工程师，也有设

9. 本文根据周其仁在2022年5月19日在佛山商道讲堂第三期上的演讲整理。文章来自南方日报。



计师，也有工匠。我们今天所有的努力，我们祖先都努力过，但是为什么没能留下一个好牌子，没能留在消费者心智中会长久起作用的影响力。这个事情要去分析。

## 民营企业转型，要从亲缘维系走向契约约束

回过头看，我们更多是用传统的人际关系在做工业产品。家族关系、亲属关系，这是人类最早的组织方式。所谓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我们古代整个国家组织都是按亲缘组织起来的，它内生就是不稳定的。

科达公司董事长边程前面讲到的一点我很受触动，不要以为亲情关系能做事，亲情关系就是亲情关系，休息的时候亲情不可或缺，但是用亲情去做事是不合适的。靠亲情关系维系，一旦亲情关系出问题，谁也救不了。在香港、澳门很多家族打遗产官司，所以我们看到有些公司是怎么起来最后就怎么倒塌。整个过程不断有生有死，最后成就以地名为主的产业园区或者叫产业带、产业圈，但是留不下一个好牌子。

所以不光是技术要改进，产品要改进，关键是文化、组织也要改进。所谓转型就是转这个型。

我们民营企业怎么起家的？不就是靠兄弟、亲戚、朋友、老乡、同学，用最现成的人际关系来做事，出发点都是这样。如果当年没做成，那“死”了就“死”了，但是成了反而是问题。财富大了怎么驾驭？怎么用更厉害的人，怎么去打更大的市场？

边程董事长讲到的科达经验，应该引起高度重视。不靠亲情靠什么？他刚才有一个词很关键，要用共同的志向，不一定有亲属关系。不是亲属关系怎么能结成一个组织，靠契约关系，志同道合，契约约束。

这个是最重要的转变，不管你怎么起家的，一定要完成这个转变。要从亲属关系的信任，转

成没有亲属关系的信任。其实没有亲属关系的信任，可以比亲属关系还可靠，要靠奋斗目标、战略、纪律、契约来约束。这是今天我认为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

其次，我们用亲情来连接我们的眼界，容易自我设限。我们在佛山调研从优秀的企业家那里学到一句话，拿着世界地图做事情，不要自我设限。企业创办在佛山，不意味着产品只能卖在佛山，不意味着产品只能卖在中国，没有这个道理。

科达制造能够杀出重围，第一就是不要局限在一个狭小的市场里头，要不断地扩展市场。边程董事长分享说，科达之所以能够从低潮走出来，就是远在低潮之前布局了非洲，而非洲战略比意想中还要成功得早。

## 产业转移不会停，企业要走出去寻找更大的机会

我经常说，最现代的产业就跟最古代的游牧业一样，是走来走去的。工业革命，从英国发起，很快就蔓延到德国，德国是后起的，美国是后起的。美国起来以后，要素价格都贵了，然后产业转移到日本，再到韩国，再到中国台湾，亚洲四小龙就起来了。接着中国改革开放，珠三角、长三角就起来了。

重要的是，这个逻辑没有停下来，它还会走。越南、印度、老挝也是一样的。其实工业革命以后，就是通过产业转移，造福全人类。

这里面有一条要引起大家高度关注，产业转移的时候，它是一些要素跟一些要素在另外一个地方结合。产业转移是怎么转移的呢，回想我们当年，是先有一批中国香港、中国台湾的老板过来，先有一批日本、韩国的企业过来。

今天中国的企业家先杀出重围的，就有责任把我们的工业制造的能力、管理的能力带到新的地方去，让原来不能享受的人口享受这种产品，

这是使命。如果没有企业家，光有便宜的劳动力，光有便宜的土地，不能成就产业转移。

这两年我一再呼吁，不要让疫情把我们的视野和活动范围都挡在了狭小的空间里，越是这种时候越要出去，触角要伸出去，你不去怎么知道会不会有机会。

上个月我访问了申洲国际，宁波的一家企业，也是针织行业，跟我在佛山张槎看的针织行业是一个行当的。申洲国际的老板也是农民企业家，家族企业起步，现在做到什么程度呢？它最令人羡慕的地方是，不需要销售部门，全是大客户、全球知名品牌派人驻扎在厂里盯货，这个月这条线给我，下个月那条线给我，不盯着就抢不到。生意做到这个程度，那是一种境界，也是努力的结果。

申洲国际董事长马建荣有一个经验之谈，他很早就在越南布局，一开始去的时候发现就不行，这个地方没法发展。在国内发展这么顺，到了一个新地方处处不顺，所以他们第一波去的全部回来了，但是后来不甘心，再去就留下来。

事实证明，这一步是很重要的，他们在越南的产能已经超过宁波产区的产能。在去年1月受疫情影响，宁波产区无法按期完成订单时，全靠越南的工厂完成了供应。所以马建荣说要隔离也还要出去，并且还要到老挝去布局。

我觉得这个事情要引起佛山企业家的高度关注。我们的触角、眼光和信息不要被疫情限制住，如果我们整个产业都是眼睛看不远，耳朵听不清，未来发展的很多机会可能就没了。

边程董事长讲到了非洲建厂，当年投当年建当年盈利，为什么？因为本地缺，而我们这里明显过剩。这两天我们在张槎调研发现，其实在没有疫情的时候，原来也过剩20%，也是开工不足的。行业都“杀”成这样了，还有什么毛利，没有毛利怎么投入，怎么做研发，哪里还有明天。那只能靠熬，中国人熬的本事大概是世界一流，这也是可敬的，也是要肯定的。

但是光靠熬你出不了头，一定要“杀”出一些好公司。用户变了，消费者买东西的时候不在乎是哪里造的，在乎这个东西好不好，靠不靠得住，新鲜不新鲜，亮丽不亮丽，这个不可改变。因为消费者对品牌的关注，所以产业界要出好公司，要出好品牌，而不能靠地域、靠亲属、靠亲缘、靠老乡、靠行政区划来做产业。

### 企业要练“平常功夫”，“关键少数”的决策者要练“非常功夫”

边程董事长讲了科达发展的三个法宝。

第一是战略，战略不可能都对，但是至少要做到对的多一点。每家公司都做过各种各样的投资，要总结经验教训。犯错误不奇怪，但是不能重复犯致命性的错误。

第二是要有文化支撑战略。战略如果没有队伍，没有文化可以支撑，那就只是写在墙上，遇到调整的时候队伍跟不上，信任跟不上。

第三是企业中做决策的“关键少数”非常重要。现在这种局面，企业中谁当家长，怎么当家，分量就出来了。形势好的时候领导者的水平高低不太重要。现在是谁也不知道接下来的问题，领导者就很重要。

接下来怎么办，要设想几种情况。假如目前的局面还有6个月，你能不能撑下去？1年呢？3年呢？各种情况下，你准备怎么应对，有没有预案？你不能听天由命、走哪算哪，人脑决策就是这个时候见分晓的。

现在预测没有用了，很多事情预测不到。所以决策顺序要倒过来，第一要有准备，为坏事做准备，好事情不要做太大准备，意想不到的坏事来了，你能不能对付？第二是应变，不管你准备得怎么样，实际发生的顺序，前后轻重都可能不一样。第三才是预测和计划。刚才边程董事长提到决策的“关键少数”，在座的董事长、总经理





在这个时候是最重要的。

前不久，佛山市工商联组织一个小分队去了一趟公牛，我们发现公牛在向一家叫丹纳赫的美国工业咨询公司学习精益。丹纳赫重新定义了丰田创造的精益生产，练就了一套工具，它前后投资了大概 700 家制造业企业，用精益化办法改造以后，股价的增值比巴菲特的投资成绩还好。

中国有很多留学生曾在丹纳赫就业，后来有部分出来了，组建了一家面向中国市场的工业咨询公司，帮助中国企业做精益化，其中第一个客户就是美的集团，现在美的已经培养出许多精益化工程师。

现在产品降价，要素涨价，怎么办？你对谁喊话都不能让价格不涨，把你管的事情解决就能帮你渡过难关。我们去看了公牛集团很受触动，后来就把公牛和美的的精益专家，还有帮助他们做精益化的工业咨询公司的专家请来向佛山的企业家介绍精益化。

今天借这个机会再重复一下这个话题，企业遇到困难的时候怎么办？通过精益化从“干毛巾”里挤点水出来，增加工人的向心力，减少企业的不当投资，这一招非常好。

还是一句话：向死而生、练平常功夫。只要

企业活着就天天练，越是恐慌、越是不确定的时候，就越要让工人有事情干。如果你天天说明天会怎样（糟糕），工人们的精神会垮掉。

当然老总光有平常功夫还不够，决策者，也就是边程董事长说的“关键少数”，还要练一练“非常功夫”，要拓展市场、把触角伸出去。未来世界的变化谁也不知道，出了问题就会有新的机会。你不进入市场，你就不知道这个东西行不行。但凡有可能，企业就要“打”出去、把触角伸出去。

国内已经明显产能过剩，我去年访问佛山一家铝材企业，了解到 95% 的铝原材料是进口的，我们加工出来再卖到全世界。别人挣的是原材料的钱，能买你多少产品？这种模式能持久吗？制造业为什么在全世界会走来走去？因为就业、税收、附加价值，哪个国家都想要，光你要是不能持久的，所以制造业一定要走出去。

就像当年其他地方转移到我们这里来一样，现在轮到中国的企业家把资源、组织能力带向广阔地带。国家提出“一带一路”倡议，沿着一带一路走出去不会吃亏的，走出去投资的收益也有一部分会回来。就像科达在非洲的投资收益回来了，最后还是对国民经济有帮助的，我们千万不能狭隘。

## 如何理解数字经济的新方针与产业未来？<sup>10</sup>

刘世锦

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

刘尚希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院长

黄益平

北大国发院副院长、数字金融研究中心主任

姚建明

中国人民大学中国企业创新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数字经济产业创新研究院院长

### 数字经济专题协商会有哪些政策信号？

姚建明：中央最近对数字经济连续发声。尤其是近期全国政协召开的“推动数字经济持续健康发展”专题协商会倍受外界关注，刘世锦、刘尚希两位委员参会并发言。下面有请两位委员分享一下参会感想及会上传递的政策信号。

刘世锦：专题协商会是全国政协参政议政的一种重要形式。这次会议主要讨论了如何推动数字经济持续健康发展。作为一名与会者，我谈几点感受。

第一，对数字经济的发展在大方向上明确了三点：1. 坚定推动我国数字经济持续健康发展；2. 坚定支持我国数字经济中的领军企业包括平台企业健康发展；3. 坚定支持民营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第二，会上主要讨论了以下内容：

1. 抓好数字技术及数字经济发展的战略机遇

期。这些年我国的数字经济发展得确实不错，有些方面甚至在全球领先，但最近出现局部领域发展放缓的问题，比如中国的独角兽企业数量增长明显减速。在全球数字经济的竞争格局中“不进则退”，我们一定要有危机感。

2. 利用好优势。中国的优势是拥有超大规模市场与较强的产业（特别是IT产业）配套能力。

3. 推动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目前这种融合主要发生在消费端，下一步要考虑如何促使数字经济进入产业领域。

4. 关于数据流通的市场化建设。要保护个人隐私和国家信息安全，这是守住底线；同时也要保护企业享有数据的一些合法权益。在此前提下，考虑如何放开各种数据要素的市场流通渠道。

5. 创新监管方式。此外，数字经济的市场组织形式、管理体制等问题也都在探索中。很多问题还在不断演化，暂时还看得不是那么清楚，这要求为数据监管方式留下足够的创新空间。

10. 本文根据作者在2022年5月22日百度财经与北大国发院合办的研讨会上的发言整理。



## 6. 加强国际数字经济的治理合作。

第三，会上提到的具体政策包括，支持平台经济发展，支持数字企业在国内外市场上市，鼓励平台企业参与国家重大科技创新项目等。

刘尚希：此次政协会议透露了一个明确信号——加快发展我国的数字经济。数字是重要的生产要素。目前，我国是数字大国，也是数字经济大国，但只是“大国”并非“强国”。要从“大国”变成“强国”，就要进一步通过改革推动数字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这次会上大家讨论得非常热烈，包括发展与安全的关系问题。安全非常重要，不安全当然是风险，但发展得慢也是风险，而发展最终可以为安全全面兜底，因为安全要靠技术迭代升级、数字经济产业生态聚合和国际竞争力提升等多方面发展来保障。这一点，目前已经形成共识。

中国的优势是市场规模超大、人口数量大、数字资源非常丰富。要进一步挖掘数据资源，把数据资源变成数据资产、数字产品并转化成各种应用场景，这会涉及到一系列体制机制改革及监管的进一步完善。

总体来说，这次会议反响很大，会议信号明确，与会者对我国数字经济的未来充满信心。

## 为什么要研究平台经济的创新与治理？

姚建明：黄益平教授作为北大国发院副院长，成立了针对平台经济的课题组，提出了很多创新性观点并出版了报告《有序繁荣：平台经济的创新与治理》。下面，请黄院长介绍一下课题的核心观点以及数字经济发展对平台经济治理提出的挑战。

黄益平：国发院是国家高端智库之一，每年都会集中全院力量做一个大课题，去年做的就是“平台经济创新与治理”。选择这个题目是因为我们主要看到当下存在的两方面问题：

第一，到2020年年中之前，中国平台经济的市场规模在国际上具有显著优势。过去有一个说法是“全世界平台经济被美国、中国和其它地区三分天下”，而其它地区也以美国平台经济为主。因此，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其平台经济的市场规模位居全球第二，特别是社交媒体、电商、短视频和电子支付等业务的全球排名靠前，这是非常了不起的成绩。我个人的体会是，我们在平台经济领域取得了突破性成果。平台经济和数字经济的核心是第四次工业革命带来的一些技术变化以及催生出的一些新产业。这也是中国第一次能够紧随工业革命的步伐，保持在国际经济技术前沿并不断创新生产模式，这是非常了不起的进步。尤其是当下，中国经济要从粗放式的要素投入型增长走向创新为主的高质量发展。

第二，从去年开始，平台经济一些领域开始发展滞后。无论是独角兽企业的新增数量还是准独角兽企业的形成数量，我国都滞后于美国甚至其他一些国家。我们看到这个行业在普遍裁员，投资额在不断减少，一些领先平台的创始人纷纷选择退休。平台经济是中国难得的能够在世界上取得相对优势的产业，因此我们应尽量想办法在规范它的同时维持其健康发展，特别是支持其完成创新。

上述两方面就是我们选择做“平台经济创新与治理”这一题目的主要动机。

对于平台经济，我们支持国家对平台经济的发展进行规范，但简单套用过去规范传统经济的思路和方法是不是合适？可能还需要做进一步的深入研究。

课题组对“平台经济”也做了定义。作为数字经济的一种特殊形态，平台经济是依托云、网、端等网络基础设施，并利用人工智能、大数据分析、区块链等数字技术工具，撮合交易、传输内容、管理流程的新经济模式，其核心是用数字技术作支持的新经济模式。平台经济最主要的特征包括规模经济、范围经济、网络外部性、双（多）

边市场、大数据分析等，这些都是过去传统经济不曾有或者不突出的特征。平台的技术特性为经济活动带来多方面的好处，主要可以概括为“三升三降”。“三升”是指规模、效率、体验提升，“三降”是指成本、风险、接触下降（甚至有一些无接触交易）。

我在过去几年主要研究数字金融问题。依托数字平台，借力数字金融，传统金融机构很难实现的普惠金融获得了极大发展。国内目前只要有一部智能手机和手机信号，人人都可以享受较平等的金融服务，这正是“普惠金融”的本意。

当然平台经济也给社会带来一些问题。比如，影响公平竞争。平台经济的基本特征是规模经济，规模经济容易造成“赢者通吃”。平台可能会利用其规模经济或范围经济形成市场势力，增加新企业进入的沉没成本从而限制竞争。再比如，我国平台经济发展较快的原因之一是对个人权益和隐私的保护程度较低。大数据算法的正面作用是给很多平台企业提供了创新机会，但负面影响是数据侵权尤其是侵犯个人隐私等问题突出。许多平台的参与者，包括出租车司机、骑手、消费者等经常感觉被算法控制。因此，对平台经营者而言，大数据分析降低了信息不对称的程度；但对平台参与者而言，大数据分析加剧了信息不对称的程度并滋生出“大数据杀熟”等问题。要解决这些问题，我们需要新的思路和更多的学术分析。为此，我们课题组成员除了经济学家，还有法学专家、国际关系学家和政治学者。

针对当下存在的很多问题，我们还需要经过深入分析才能判断它们是不是具有存在的正当合理性，是不是按照传统的思路就可以解决。

为此我举两个例子：

第一，规模经济。过去反垄断主要依据市场份额。在传统的石油、钢铁等行业，如果一家企业的市场份额占到70%-80%，其垄断市场的可能性就很大。但在数字经济中，市场份额占到70%-80%的企业却不一定具有垄断地位。经济

学概念中有个“可竞争性”，指在规模经济条件下，实现充分竞争的关键在于进入与退出的“沉没成本”高低。“可竞争性”意味着，随着一系列新平台的进入，某一平台即便占据了较大的市场规模，它面对的潜在竞争压力仍然很大，其市场份额仍可能下滑，因此它并不拥有绝对的垄断地位。

第二，差异化定价。平台针对不同用户可能有不同定价，有人称之为“歧视性定价”。这样的差异化定价是否合理？针对不同消费者提供的服务是否有差异？利用数据算法实行差异化定价的边界到底在哪里？这些问题都值得关注。

简单总结，我们选择“平台经济创新与治理”这个研究题目，是因为平台经济具有很多新特征。这些特征既给我们带来了很多好处，也造成了一些问题。在谈平台治理时，很多问题需要做深入的经济学分析，因为平台经济中有些问题的存在是不合理的，但有些问题的存在具有正当理由。

## 如何走出当前“不进则退”的局面？

姚建明：请问刘世锦主任，如何抓好数字经济的发展机遇，打造我国数字经济的新优势？

刘世锦：我们在理解数字经济的概念时还要下工夫。数字经济不仅涉及技术问题，也是一种新的经济形态，它是继农业经济、工业经济、信息经济后，由产业革命扩大而形成的一种新经济形态。因此，我们要从经济形态的高度来理解数字经济以及它所涉及的各种关系。

如果将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做一个形象的比喻，互联网类似于实体经济中的高速公路，大数据是高速路上卡车运送的原材料，云计算、云储存相当于一个仓储设施，而人工智能是用数据生产数据的机器设备。人工智能、区块链技术在重构经济中的各种联系或关系。

最近几年，数字经济在发展中有几大突出功能：



1. 信息密度空前增加。四十多年前，农村一个村里可能只有一部手摇电话，几千上万村民通过这部电话获取或传递信息，而现在人人都有一部甚至多部手机且可能24小时开机，所以说数字经济使数据的信息密度空前增加。

2. 信息相互连接。快速发展的电商平台将产品、生产者和消费者联系在一起。

3. 优化实体经济。数据增加又被连接后可以优化实体经济，比如外卖小哥的送货路线经过数据优化后变得更加快捷、经济，降低了服务成本。

4. 预测未来。通过总结历史、现在及未来的事物运行规律预测未来，即便未来一定还会有很多不确定性，但可以预判到更多的规律性走势，特别是捕捉到大的拐点，这样就可以提前做出优化安排。数字经济预测未来的作用，我们才刚刚开始利用起来。

关于数字经济的发展，最近常说的“实体经济的数字化，数字技术的实体化”，对当下的生产方式产生了巨大冲击。这些年电商发展起来以后，很多中小实体商店甚至大型百货公司都经营不下去，商场里经常是售货员比顾客多，电商对实体商店的冲击很大，所以有人说“虚拟经济在冲击实体经济”。但这并不是什么新鲜事，历史上几次大的产业革命也带来类似的事情，比如蒸汽火车出现后就对马车造成巨大冲击，大家也回不去马车时代。黄益平做了很好的总结，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讲，数字经济降低了生产成本，为消费者提供了更多选择，增加了社会福利。当这样的巨大变革发生后，整个社会受到全方位的冲击，包括产业组织形式、就业结构等。

数字经济时代，平台企业的规模比工业革命时期的企业规模大很多，而市场份额第一和第二的企业之间差距很大，所以可能存在大企业“赢者通吃”的垄断风险。“赢者通吃”就会产生不平衡，包括企业组织、市场秩序、经济、社会甚至政治的不平衡，这将使整个社会的经济、产业和市场结构面临重整。平台经过算法向消费者推

荐商品，消费者购买商品时可能发现第二次的购买价格比第一次贵，这就是遇到了常说的“杀熟”问题，消费者会感觉商品价格的不确定性甚至受到“歧视”。还有些平台企业，凭借资金优势压低价格来挤压竞争对手，而不是通过提升生产效率或经营方式来参与竞争。还有些借助金融科技的诈骗行为，利用互联网平台搞古老的“庞氏骗局”欺骗消费者。这些问题涉及平台本身的问题，也与市场问题甚至社会问题有关。因此，我们需要出台与平台经济发展相匹配的竞争政策、反垄断政策、就业政策和社会结构调整政策，以应对数字经济对实体经济带来的全方位冲击和调整。

数字经济带来这么多问题，我们到底应该怎么看待数字经济？用一句老话总结——这些问题都是发展中的问题。这里有两层意思：

第一层意思，这些问题是数字经济发展以后才出现的问题，也意味着是不发展就不可能出现的问题。如果没有算法推荐和互联网平台，就不可能出现“杀熟”问题。但是能不能不发展数字经济呢？不能，因为不发展才是更大的问题。

第二层意思，要对症下药。现在讨论这些问题的目的是为了解决问题，让数字经济在下一步获得更好、更顺畅、更被各方所接受、更具可持续性的发展，而不是不发展，更不是要倒退。这一点需要明确。

**姚建明：**请问刘尚希委员，您在这次政协会议上提到一个观点，不安全是风险，不发展、发展慢更是风险。数字经济监管应如何兼顾促发展和保规范？

**刘尚希：**人类文明在经历了农业文明、工业文明后进入数字文明。从工业文明到数字文明，经济形态也从工业经济发展到数字经济。数字经济应被理解为经济形态的新形态和新趋势，而不是现有国民经济行业分类中的一个新类别。由于目前数字经济还没有完全发展起来，所以我们在理解数字经济时把它视为现有国民经济中的一个类别，比如我们常说“数字经济占国民经济的比



重是多少”。这是暂时的。若从发展趋势来看，以后主导的经济形态将是数字经济，现在的工业经济都将被数字化而变成数字经济的基础，而不再是主导的经济形态。等到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后，整个国民经济都应当是数字经济形态。此时不仅经济数字化了，社会也要数字化，我们会迎来数字社会，人类会进入数字文明。因此，当数字经济还处于尚未成熟阶段时，它可以被视为国民经济的一部分，但从它的发展前景来看，它应当是相对于工业经济而言的一种全新经济形态。只有这样去理解数字经济，我们才能准确把握经济发展趋势以及当前的“实体经济”与“数字经济”之间的关系。

数字平台是数字经济的微观基础之一。工业经济的微观基础是企业、工厂，而数字经济微观基础的主要组织形态就是各种平台。平台企业是数字经济的神经中枢，如同企业、工厂之于工业经济一样。这是数字平台和数字经济的关系。

关于数字平台的治理和数字经济的治理，前者是从微观来看，后者是从整体来看。工业经济中对企业的管理，是需要企业遵守技术和安全规范，并通过国家监管来保证生产安全、消费安全。到了数字经济时代，工业化时代的监管思路已经不完全适用了，而适应数字经济、数字平台企业的新的监管思路、监管方式仍在摸索之中。

目前数字经济发展尚不充分，很多问题只有等发展到一定程度以后才会充分暴露，很多问题也要依靠数字技术本身发展起来之后才能被解决。比如，保护个人隐私要靠技术进步，有了隐私计算技术就可以实现对数据“可用而不可见”，既保护个人隐私又让数据得以流通和使用。保护数据中的个人隐私，不是简单用法律和行政监管手段就可以很好地解决的，过多的禁止或行政许可，那只会妨碍数据的流通和使用，而数据只有在流通和使用中才具有价值。因此，对于数据的治理和监管问题，其答案最终蕴含于快速的技术迭代升级中，蕴育于数字产业的发展中，蕴育于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中。发展中的问题，最终要靠发

展来解决。

数字经济中技术的迭代升级速度相当快，可谓“一步赶不上就步步赶不上”。这需要给数字平台、数字经济足够的发展创新空间，否则数字经济就面临发展放缓甚至停滞的可能。从国际竞争的角度来说，数字经济发展放缓就意味着国家的安全隐患增加。

从“俄乌冲突”可以看到，俄罗斯的信息数字技术和西方国家相比差距较大，因而陷入被动。因此数字技术能否实现快速升级，涉及到国家安全、产业安全和国家经济竞争力。

在数字经济时代，不仅是制造业，各产业发展都要数字化，由此提升产业的国际竞争力。在制造业，有了工业互联网平台和虚拟制造，产业效率可以大幅提升。在金融业，只有当数字金融成为一种新形态，我国金融业在国际上的竞争力才能进一步增强。在服务业包括公共服务领域，政府数字化建设才能大幅提高政府的效率。

目前，我国的数字经济是“大而不强”，正面临与美国拉大差距甚至被其他国家超越的危险，因此我们要有加快发展数字经济的紧迫感。面对安全和发展，我们看问题要分清主次，解决问题要有层次，要把发展摆在首位，把解决安全放在发展中来考虑，发展是第一要务，要通过发展来解决安全问题。

数字经济治理，要避免合成谬误。现在涉及数字经济治理的政府部门大概有二十多个。各部门站在不同角度加强对数字平台和数字经济监管，其动机和出发点都是希望数字经济健康、快速发展，但在多方监管中又无意识地造成合成谬误，阻碍数字经济发展。如何解决合成谬误问题？这是当前数字经济治理中的关键。

## 如何探索合理的数字经济监管模式？

姚建明：请问刘世锦主任和黄益平教授，如



何进行数据确权和数据监管？如何理解数据的要素价值，如何把握数据治理的关键点？

刘世锦：关于数据确权的问题现在讨论得较多，但目前很难有一个定论，因为数据确实有一定的特殊性。今天我仅从如何推动问题解决的角度，提几点想法。

首先，中国目前正处在数字技术和数字经济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期，我们必须利用好这个机遇期。要坚持“用”字当头，把“用”摆在前面，平衡和处理好数据的产权保护、安全和利用之间的关系，这一条可以作为各地政府发展数字经济的基本方针来加以明确和坚持，既要重视数据产权保护不利、数据不安全等问题，也要防止有关利益主体借口数据产权和安全问题人为限制数据的流通和使用。强调数据保护和数据安全，要抓主要矛盾，“用”字当头，不能本末倒置。

其次，在此前提下，目前对数据确权反映最多的两个问题是关于个人隐私保护和国家安全，以及企业的数据增值权益。

现阶段，我们对有些问题看得还不是很清楚，也不一定能够讲清楚，所以如果马上出台一个法律把问题定下来，效果也不一定好。因此，我们可以从问题导向的角度来看问题。对那些在实践中看得比较准、有共识的问题，比如个人和机构的隐私、国家安全等重要方面，可以列出一些不能流通或不能交易的负面清单，以此守住数据的产权保护和安全底线。对那些暂时还看不太清的问题，我们的胆子、步子可以更大一些，利用隐私计算等技术放开搞活各类数据流通渠道。

随着隐私计算等技术发展，我们可以实现数据可用不可见，数据和信息适度分离。利用隐私计算，可以隐藏身份证上的个人姓名、住址等隐私信息，提取身份证上某个地区或某类人群的综合数据或抽象信息，最后保证个人隐私的同时又增加了数据的可用性。隐私计算技术相当于一个“黑箱”，这头把涉及隐私信息的数据放进去，另一头出来的是不涉及隐私的可用数据。

过去我们想解决很多问题时遇到技术瓶颈，于是不得不制定政策法规，最后发现效果也不好。如果技术上被突破，很多问题就迎刃而解了，这也是数字经济很重要的特点。比如区块链就在智能合约中发挥重要作用，“合约”解决的是信任问题，区块链把可能出现的造假都从技术上堵住了。所以，当经济发展起来后，我们就可以利用技术来解决问题，包括大家目前觉得最难解决的安全和发展关系问题，因此我们要高度重视数字技术、隐私计算技术、区块链技术的发展，政府要带头推广这些技术。

平台监管中还有很多问题暂时说不清楚，因为问题还在发展中，包括反垄断问题。某一平台占的市场份额可能很高，但这个平台上入驻了几十万企业以及几亿消费者，它是一个交易场所，和传统的大型石油、钢铁企业已经不是一个概念，因此对平台企业反垄断也和传统企业不一样，需要继续探索。

最近有些地方已经出台了地方性意见、条例或法规，其中有些侧重保护消费者隐私和国家数据安全，有些则侧重保护企业数据权益。虽侧重点不同但各有各的道理，我们不急于下结论，可以让各地监管部门差异化地去尝试。等尝试一段时间，等数字经济进一步发展，有些问题可以更加准确地把握时，再出台一些全国性的法律法规，效果也会更好。

最后，对数字企业的监管需要具备全球眼光。这次刘鹤副总理在讲话中特别强调，数字经济发展必须坚持对外开放，特别是着眼于人、发力于人，以开放促竞争，以竞争促创新。我们要积极参与全球数字治理进程，要能够与国际对话与协同，因为数字经济是全球化的经济。我们应逐步形成既有中国特色又与国际接轨，既经过时间验证有效，又能在国际上把道理讲得通的新的管理模式。这是我们在数字经济监管方面应该努力实现的目标。

黄益平：与数据有关的事情确实重大。

中央提出要让数据成为新的生产要素，我们习惯说“数据是数字经济时代的石油”也充分说明数据的重要性。过去这段时间我国的平台经济、数字经济快速发展，一方面数据的优势得以充分展现，另一方面也导致了新的问题，比如非合规合法收集或使用数据等。因此，规范是必要的，但是决策层已经明确，规范的目的是在规范中发展、在发展中规范，是要把数字经济做得更好、更优。

关于这方面，我简单补充以下几点：

第一，借鉴国际经验。在不规范和规范之间，最终选择的是失去什么和得到什么。国际上数据治理比较有代表性的是美国、欧洲和中国。其中欧洲的数据治理体系最完整，数据保护做得最好，但客观来说欧洲以大数据分析为基础的业态相对不活跃。数据一旦管死就影响生产力。关于数据的使用，我们在起步时没有任何规范制度，导致走到另一个极端，如今要在规范和创新之间寻找平衡点。如刚才刘世锦主任所讲，有些问题如果刚开始时把握不好，不妨先尝试，在探索中慢慢改进，而不是出现问题就开始管制，最后得不偿失。

第二，传统的要素治理对数字经济已经不适用。要让数据成为新的生产要素，于是一些人开始套用针对劳动力、资本和土地等传统要素的治理方法来应对数据治理，如怎么确权、交易和定价等，但数据作为生产要素与传统生产要素很不一样，它的确权问题并不是那么清晰，它的交易问题也和劳动力资本有很大不同。

我们做关于平台经济的研究，就是因为平台经济和数字经济中有很多事情需要我们去分析和尝试，简单套用过去的方法已行不通。如果把所有的数据都确权，那么将来数字经济就很难继续发展。因此我认同刘世锦主任的观点：一方面应关注涉及个人隐私和国家安全的数据安全，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数据活动的参与者和创造者对数据生产都有贡献，需要我们创新方法去应对数据治理。现在各地都在搞所谓的“大数据

交易中心”，就是用传统要素治理的办法来对大数据定价与交易，试图让数据资源有效配置起来。事实上，大数据直接交易非常困难，成功者寥寥。

第三，在考虑数据安全和规范时，仍然要考虑保持市场活力。一些科技公司、私营公司在掌握数据后并不能很好地保护消费者利益且可能对国家安全造成隐患。于是有人提出让国有企业或国家机构来掌握数据，提高数据使用的安全性。的确，目前民营企业的不规范行为很多，而国有机构相对守规矩一些。但一旦数据都集中到国有机构，创新可能会出现。现在最活跃的平台企业几乎都是民营企业，原因就是它们一方面有强大的创新动力，另一方面有支持创新活动的雄厚资源。所以我的建议是，数据安全很重要，但可以更多地通过行业规范来维护数据安全，而不是把数据从民营企业或者民营机构那里转移出来，否则将影响创新与效率。

关于数据确权，凡是涉及数据积累和创造的各方都应该是利益相关方，而在算的过程中要保护隐私、保护各方权利，像隐私计算技术就非常重要，这甚至涉及到将来我们能否参与国际数字贸易。我们应该清楚，中国将来不仅要参与国际数字贸易，还要参与国际数字贸易规则的制定，就必须像欧美国家一样，积极面对数据的跨境流动和知识产权保护问题。

## 政府部门如何更好地实现监管协同，减少合成谬误？

姚建明：请问黄益平老师，政府部门应如何协同发力，从而更好地把平台经济治理好，推动数字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黄益平：加强监管非常必要，但是多头监管——行业监管、市场监管、金融监管等，确实一定程度上出现了合成谬误问题。我们有几点看法和大家分享：

第一，设立综合协调机构。从平台企业的角



度来说，每家监管机构所做的事情都有必要，但同时来就压力太大，使企业情绪低落。我们的原则是在规范中发展，在发展中规范，所以需要协调。建议不要使用“强监管”这种说法。监管应是日常行为，“强监管”有运动式监管的意思。

第二，适度把经济监管和反垄断执法分开。奥巴马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哈佛大学的杰森·福尔曼曾经帮英国政府做了一个关于数字经济治理的政策报告。我和他讨论过，平台治理的重点对象是大平台还是小平台。他的看法是把大平台管住就可以，而我认为在我国大小平台都要管。后来我对我俩的不同看法思考了很久，我猜出现分歧的原因在于，反垄断问题已经是英美国家的监管面临的主要问题，因为西方的头部平台企业已经高度垄断了市场。但在我国，垄断还不是平台企业的主要问题，平台之间的跨界竞争仍然非常活跃，虽然某一家平台企业的行业市场份额一时很高，但行业进入门槛并不太高。因此，我国平台企业治理中最重要的是规范企业行为，而不是反垄断。最近政治局会议上也提到，对平台的专项整治已基本结束，下一步将迎来日常性的监管。

## 平台企业如何提升自身的治理？

**姚建明：**请问刘世锦主任，如何鼓励地方和企业积极探索数字经济的治理方式，尤其是自身就提升治理水平？

**刘世锦：**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个准确的、清晰的答案。关于平台企业的治理问题，首先是它具有双重性特征。一方面，它作为企业本身规模很大，所谓“老大比过去更大”，因此针对它可能存在的垄断和不正当竞争问题需要去监管。另一方面，平台要对入驻该平台的成千上万的企业以及若干亿的消费者进行监管，它需要去维护平台上企业之间的市场秩序，包括治理制假售假等问题。

现在有一些问题不大清楚，比如有人提出要对平台企业的算法进行监管。我不是很清楚要对什么算法、哪一类算法进行监管，因为这本身是个技术问题。另外能否监管得了也不清楚，因为算法一直处在逐步迭代的过程中。还有，有些平台对入驻规模比较大的企业提供一些特定服务，比如给他们引流量，替他们做宣传，这实际上是给他们赋能。怎么去界定平台和这些企业的关系，以及这些企业和平台上其它企业的关系？现在政府对平台有一些监管要求，这些要求还要转化成对入驻平台的企业的要求，怎么来实现这种转化？这些都是我作为外行、消费者能够看到的问题，但解决办法还看得不清楚。

总体而言，目前平台企业的治理和平台企业本身的发展还处在上升期，没有达到比较成熟的阶段，且上升的空间还很大，包括平台经济的市场结构调整等。这些问题可能需要各方承担起自己的责任，共同努力，更多探讨，摸索规律，对有些还不清楚的问题留下探索空间，不要急于下结论。如果简单下结论，最后回顾历史会发现是不负责任，对行业发展不利。

数字经济的发展需要有关各方继续摸着石头过河。最近我经常讲“摸着石头过河”。有人问，改革开放四十多年了，还要摸着石头过河？是的，因为河不一样了。四十年前，我们要过的河是如何解决农村怎么搞联产承包责任制，如何搞企业股份制，如何搞深圳特区等等。四十年后，我们遇到的问题是怎么样搞数字经济，如何监管平台企业。因为这些问题都还不清楚，所以我们还要继续摸着石头过河，哪怕是试错，也是为了能找到一个对的方向。在看待数字经济发展的问题上，平台、入驻平台的企业、消费者和监管部门等有关各方，只有大家都秉持一个比较谦虚的态度，多探索，多讨论，为创新留下足够的空间，都求真务实，最后才能推动这个行业比较正常地发展。

**姚建明：**政协专题会议之后，很多平台企业表示要更多地为商家做事，更好地成为数字化金融阵地等。您怎么看这些反应？



刘世锦：这说明平台企业在反思之前出现的一些问题。实际上，平台企业需要对行业发展有更长远的预期。他们有时反应只是迫于某种压力、为平衡而采取的短期措施，这些措施是否真正有助于行业长期发展值得深思。现在政策信号很明确，支持平台企业、数字经济健康发展，为平台企业创造一个比较宽松的、可持续的、稳定可预期的发展环境。因此，一些平台企业的信心也在增强，这也是我们所期待的比较好的局面。

## 如何支撑平台的创新活力？

姚建明：请问刘尚希主任，政府应该如何创新治理方式？如何引导资本？如何规范产业未来的健康发展，尤其是保持创新的活力？

刘尚希：简单来说，企业是研发创新的主体，研发创新离不开资本支撑。在研发过程的不同阶段，需要不同形态的资本来支持。比如初期需要种子基金、天使投资，到中后期需要一些权益性基金、风险投资跟进。

从现实来看，资本对研发创新具有孵化器的作用，助推研发技术成果产业化以及变成现实生产力。研发和资本不能分离，离开了资本的研发，即使成功了，也可能只是单纯的技术创新，可以展览，但难以通过产品化、市场化转化成为现实生产力。

目前出现问题的地方涉及资本如何规范。关于资本规范，大家谈到较多的是针对资本的“红绿灯”。按照市场经济的基本要求，国家也早已明确，实行负面清单管理。负面清单上的禁止性条款是不能触碰的“红灯”领域，而“绿灯”领域需要审批和行政许可。从发展趋势来看，负面清单会越来越短。从法治角度考虑，资本规范需要和平台企业创新有机融合。

数字技术的迭代升级很烧钱，投资者只有看到未来产业的前景才会愿意投入。同时，独角兽企业越多，意味着创新越多，最后转化为现实生

产力的可能性就越多。产业孵化的过程是从一个想法、研发、产品、市场化到最后变成产业的过程，这个过程一直需要资本持续跟进。从这一点来讲，创新和资本不能分开。不能一方面强调创新的重要性，一方面对资本的“红绿灯”设置又是另一条思路，那会出现合成谬误或分解谬误，最终可能导致数字经济发展放缓。数字经济健康发展与资本健康发展，二者要有机结合起来，不能当成两个问题去分别对待，否则又会出现新的问题，为数字经济发展带来更大风险隐患。

数字经济要尽可能少用那些针对工业经济的监管措施，避免刻舟求剑，要与时俱进。如果缺少反思、风险评估和审慎包容，很可能会陷入好心办坏事的结局。比如数据确权的问题，原始数据大多是行为数据，要确权给行为人非常难。采集上来的原始数据若不进行加工处理，也就不具备任何价值，即使确权也没有意义。另外，原始数据中包含的信息维度很多，通过加密计算等数字技术既可以保护个人隐私又可以数据实现价值，还可以激励数据的流通和使用。这意味数据确权，依赖于新的数字技术手段，而非法律条文和行政措施。

工业经济的监管方式整体上在数字经济治理中行不通，因为工业经济的时间、空间都是分离的，而数字经济的时空是一体的。也许从我国的会计监管改革中可以找到一些启示。计划体制时期对所有行业都制定了一套会计制度，对企业记帐核算做了严格的规范要求；市场化改革之后，只发布会计准则，允许企业根据会计准则和行业特点设立自己的帐簿体系和会计制度。会计监管重在建立新规则和进行引导，而不是绑住企业的手脚。这样企业既不违反会计准则，又可以根据行业和企业特点制定自己的会计体系和会计政策，以满足企业自身管理的需要。如此一来，监管在宏观上有方向、有规则，微观上放开、分权，经济就活了。

针对数字平台治理，可以借鉴 ISO 社会责任体系和 ESG（环境、社会和治理）理念去引导，从宏观上管住而不是在微观上对所有事项、行为





都去监管。一旦落到微观行为监管，其创新就很难有内在动力了。而当监管所带来的合规性成本大到一定程度，创新就会停滞。对资本、平台、算法和数据采集等一系列监管都应当从宏观上去考虑，从规则上去引导，最终让行业形成自律。只有这样才可以既做到规范，又实现发展。

对创新来说，应该是“在发展中规范”。凡事按照规定动作来，就很难实现创新。创新是在无人区，在没有人带路的情况下发生的。如果都规范了，都有路径了，那就不是创新了。在发展中规范、创新，在创新中规范。

**姚建明：**有观点认为，如果平台做是太大，对于创新反而是一种遏制，所以看待这个问题？怎么保持平台在大发展之后继续创新？

**黄益平：**我的一个简单看法，企业或平台在市场竞争的压力下最容易创新。中国的平台企业最具有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只用二十多年甚至几年时间就做成了世界领先企业，主要归功于创新。这说明只要有市场机制、市场激励与竞争压力，企业就会带来很多创新回报。

很多国家的平台企业在壮大之后发现可以获得垄断利润，然后创新动力下降。从政府的角度来看，要让平台保持创新的动力，最简单的做法就是去维持一个竞争的市场环境，让平台总保持竞争的压力。经济学里讲“可竞争性”市场，即便平台规模很大，只要保证企业仍然面临很高的竞争压力，保证新的竞争对手进入市场的门槛较低，就不会出现绝对垄断的问题。所谓门槛较低，不仅是企业入场的牌照问题，还包括与企业有关的客户问题和数据问题。

从长远来说，虽然我国平台企业的规模较大，但在技术上领先全球的企业还不多，因此要参与国际竞争就必须创新。而帮助平台企业参与国际竞争，既可以是鼓励国内企业走出去，将来也可以让国外企业进来参与国内市场竞争，这对推动国内平台企业的创新有好处，对改善行业的竞争程度也有好处。

总之，维护市场的竞争程度是保障平台持续创新的最重要条件。

## 数字经济如何在经济下行时逆势而上？

**姚建明：**请问两位刘主任，目前全球经济的下行压力非常大，数字经济如何继续做大做强，逆势而上？

**刘世锦：**当前国内外经济下行压力都很大，大家在探讨新增长动力在什么地方，我认为数字经济就是重要的动力之一。

1. 数字经济富有创新。最近几年，创新领域中的独角兽企业大部分都是属于数字技术领域。

2. 数字经济带动了就业。国家统计局公布了一个数据，中国灵活就业人数已达2亿，其中绝大部分就业都集中在数字经济领域，特别是经济很活跃的一些城市和地区，比如外卖骑手、网络主播都是近年新兴且快速增加的岗位。

3. 数字经济具有很强的普惠性。这对缩小收入差距、推动“共同富裕”发挥了巨大作用。

最近几年我们去农村调研，看到因为电商平台及物流体系，农产品只需两三天时间就可以卖至全国各地，这在过去很难想象。西部地区的一个村庄，过去冬天天一黑大家就都睡了，而现在村里凌晨一点还灯火通明，很多人都在搞直播卖农产品。因此，数字技术带动的数字经济发展对短期稳增长、长期可持续增长都非常重要。

关于“稳增长”有四点内容：

一、稳预期。稳预期需要一些政策宣示，包括对数字经济发展需要一些宏观政策和行业专项政策。更重要的是，要出台一些具有标志性的深化改革开放的大举措，这样才能实质性地增强大家的信心。

二、发展数字经济，这里要特别调动两个“关键少数”的积极性。

第一个关键少数,是企业家。在工业革命早期,资本家、投资者和企业家往往是同一个人,但现在情况发生了变化了。现在真正的企业家是组合土地、劳动力、资金和数据等资源的人,这些原本零散的资源要靠企业家组合起来发挥效用。中国这些年的数字经济发展很快,有些企业仅用几年时间就壮大了起来,是因为一批拥有企业家精神的企业家,他们有重新组合资源的能力、敢于承担风险、有胆识以及很强的执行力。现在特别需要鼓励企业家的积极性,特别到了数字经济阶段,对企业家精神的需求比以往更加迫切。

第二个关键少数是地方官员。我一直讲一个观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很重要的一个特点就是地方竞争。每个地方经常会看到有一些领导人是具有企业家精神的人。企业家精神是一种创新精神,地方政府领导人也可以具有企业家精神。有些地方就是因为有了具有企业家精神的领导人,整个地方的面貌就不一样了。地方负责人不能懒政。发展数字经济需要具有企业家精神的领导人,我们要让这样的人才脱颖而出。

三、重视对前沿科技的创新。我国的数字经济这几年发展不错,但真正来自中国的创新技术很少,这次政协会议特别强调要突破关键技术。这几年我们也在讨论所谓“卡脖子”问题。“卡脖子”的核心涉及技术问题,但底层技术实际上是一些前沿的科研成果,所以要想在底层技术和源头创新上突破,关键要能够形成一种与前沿科技成果相配套的自由探索的环境、文化和机制,特别是激励机制,而这正是我们目前比较缺失的东西。

四、要强调顶层设计和基层实验相结合。顶层设计主要是“指方向,画底线”,把往东还是往西的大方向说清楚,把什么事不能干、什么局面要避免的底线画清楚。除此之外,要放手给市场,尽最大努力去调动地方基层、企业和个人的积极

性,让他们去探索。只有让市场活跃起来,让市场的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所谓的创新驱动高质量发展才能真正落到实处。

刘尚希:做强、做大数字经济,还要对一些基本问题、基本概念深化认识,尤其是对数字经济的认识。现在有一种说法是“要加快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的融合”。这里将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视为一个对立关系,但未来的经济形态都是数字经济,因此和数字经济相对应的概念是工业经济,而不是实体经济。否则,要么逻辑上不通,要么就会无意之中造成数字平台企业与其他企业的对立,不利于数字经济的发展。

从发展过程来看,现在以工业经济形态为主,以后会以数字经济形态为主,并且数字经济会逐渐替代传统工业经济,农业和工业会一起变成数字经济的基础并在数字化过程中不断升级,最后传统工业就不存在了。因此,数字经济应是和工业经济而不是和实体经济相对应的概念。

刘世锦主任前面讲过“先有路,后有灯”。数字经济是不断创新的过程。如果路都没有,当然也就不需要提前安装红绿灯!要开拓一条新路,没有现成模式可以照搬,谁也不知道未来的数字经济会是什么样子。等创新到一定程度以后,等创新转化成现实生产力并形成产业后,再考虑设置“红绿灯”问题。即便设置“红绿灯”也是涉及少数领域,因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红灯就是负面清单,绿灯就是行政许可。

既然数字经济代表未来的经济形态和增长潜力,那就需要不断地鼓励创新。在这方面,要继续走好群众路线。创新要靠群众路线,经济发展、经济建设也要走群众路线。只有相信群众,依靠群众,组织群众,让他们去配置资源、去创新,经济才能充满活力。数字经济作为一种新的经济形态,更应当贯彻群众路线。一旦把群众路线走好了,很多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



# 我国双碳目标的背景、产业逻辑与政策原则<sup>11</sup>

王敏

北大国发院经济学长聘副教授、北大环境与能源研究中心副主任

## 双碳目标的时代背景

### 1、全球气候变化的基本事实

2021年，IPCC（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发布第六次报告，公布了以下几个基本数据：自工业革命以来，全球气温上升了1.1摄氏度。全球二氧化碳排放从1850年的2.08亿吨增长到2019年的362亿吨。这意味着目前全球大气二氧化碳浓度和地表温度分别为200万年内和12万年内最高。

根据过去两千年全球平均气温趋势图，工业革命之后全球气温急剧上升。根据IPCC的报告，如果2050年全球实现碳达峰，本世纪末全球气温将上升2.1—3.5度，这是一个非常高的水平，将带来以下两方面的影响。

一是极端气温、极端气象情况增加。近年来全球极端气象愈发频繁，比如去年7月，我国河南省郑州市连遭暴雨袭击；差不多在同一时段，整个欧洲西部也遭遇了有历史记录以来最严重的一次洪水；北美洲西部也在去年遭遇历史最高气温。此外，据印度气象局表示，在2022年4月，印度西北部和中部遭遇了122年来同期最热天气，新德里有两个地区的气温分别达到49.1℃和49.2℃，气温最低的地区也达到了45.5℃。印度气温高，湿度也高，可能对社会带来更大影响。

二是自然生态和人类经济活动会受到巨大影响。过去70年，全球的冰山下降了约33米。气候变化对人类社会经济的影响是方方面面的，不但给农业生产带来负面影响，而且增加死亡率，降低劳动生产率和企业投资，降低经济增长速度，特别是会影响一些贫困国家的经济增长。比尔·盖茨曾提过，气候变化的影响可能比疫情的影响要大得多。

全球气候变化的主要原因是1850年工业革命以后全球碳排放形成的“温室效应”。下图展示了自1850年以来全球的碳排放数据。从1850年到2019年，全球二氧化碳排放量已从2.08亿吨增长到362亿吨。过去150年全球平均气温上升1.1摄氏度，主要源于碳排放的增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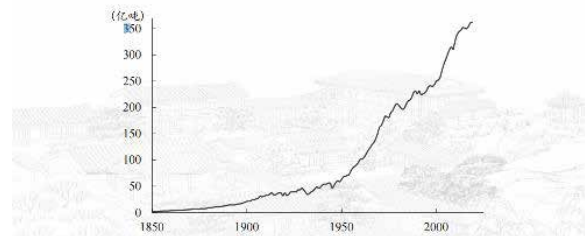


图2. 1850-2019年全球二氧化碳排放总量

数据来源：World Resource Institute (WRI)。碳排放数据包含农业生产、森林砍伐等非化石能源的碳排放。

目前，中国是全球最大的二氧化碳排放国。从下图可以看出，2019年中国的二氧化碳排放

11. 本文根据王敏在2022年5月28日北大国发院MBA讲坛第46期上的演讲整理。

量约为 110 亿吨，美国约为 53 亿吨，欧盟 29 亿吨，印度 25 亿吨。我国一家的二氧化碳排放量相当于后面几大经济体二氧化碳排放量的加总，在国际上也因此承受了较大政治压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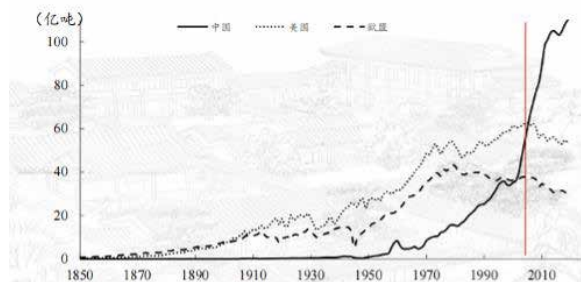


图3: 1850-2019年美国、欧盟和中国二氧化碳排放总量

也有观点认为，中国是后发国家，工业革命之后的二氧化碳主要由发达国家排放贡献。从 1850 年到 2019 年，美国、欧盟和中国分别累计排放二氧化碳 4332 亿吨、3012 亿吨和 2028 亿吨，占同期全球累计总排放量的 26%、18% 和 14%。因此，即使从历史累计排放量看，中国也是第三大排放经济体，面临的压力也不小。很明显，中国 2002 年入世后二氧化碳排放量急剧上升，在 2007 年超过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碳排放国。也正是从那时开始，中国在气候变化问题上开始面临较大国际压力。

### 2、2009 年哥本哈根气候会议

在 2009 年哥本哈根气候变化会议上，我国首次在国际上做出承诺：在 2020 年实现非化石能源占比 15%，单位 GDP 能耗相比 2005 年下降 40%-45% 的目标。为了完成这一目标，我国做出了很多努力。根据我们的研究测算，我国在风电、光伏这类新能源行业投入的总补贴金额超过 2 万多亿人民币。这是一个非常可观的数目。

### 3、2020 年联合国大会

2020 年目标完成了，但气候变化和二氧化碳排放量过大问题仍然存在。

下一阶段怎么办？这也是习主席在 2020 年

9 月第七十五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提出“双碳目标”的一个重要背景。因为碳排放量还在增长，习主席提出中国将采取更加有力的政策和措施，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 2030 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 2060 年前实现碳中和。这一目标非常紧迫，压力很大。按 2010 年美元计价，美国、日本和欧盟这三大主要发达经济体，分别在人均 GDP 达到 5 万美元（2007 年）、4.6 万美元（2007 年）和 1.97 万美元（1979 年）时实现碳达峰。根据我们的增长模型预测，同样按 2010 年美元计价，中国的人均 GDP 到 2030 年预计在 1.4 万美元左右。这意味着中国要在一个相对较低的人均收入水平实现碳达峰，压力显然非常大。更大的挑战来自于我国体量庞大的碳排放总量和全球气候变化形势的愈发严峻。在上述大背景下，我国不得不设立一个比较积极的政策目标。

### 4、我国应对“双碳”目标的现状

2020 年后，“双碳”目标在具体操作层面大致落地了两类政策：

一是行政命令政策。2021 年出现的“拉闸限电”是这类政策的典型代表。在我们的集中体制下，行政命令政策往往是依赖中央定目标、各级地方政府逐层分解并实行一票投决制的办法去实施执行。去年不少省份正是因为难以完成能耗目标，不得已才拉闸限电，这是原因之一。另一层原因则是电价机制问题。

二是市场化的价格政策。比如我国在 2021 年启动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主要是通过碳排放权交易形成碳价，并通过碳价引导企业节能减排。这是一个全国性的市场，第一批就将全国近 2400 家火电企业纳入，而我国火电企业的碳排放量在总碳排放量中的占比约为 40%。

### 经济发展规律和碳排放的关系

2019 年，在我国 110 亿吨二氧化碳排放总量中，化石能源的二氧化碳排放约有 99 亿吨。





从经济学基本原理来看，化石能源二氧化碳排放总量主要由四个因素决定：经济总量、产业结构、技术水平和能源结构。到 2030 年这四个变量将发展到何种水平？从这一点切入，我们可以大致估算 2030 年时化石能源二氧化碳的排放总量。

### 1、经济总量

经济总量是影响碳排放的最重要因素。北大国发院“中国 2049”课题组曾对此作出预测研究，在 2021-2030 年间，我国潜在实际 GDP 年均增长率在 5% 左右。这意味着到 2030 年，中国 GDP 总量约为 170 万亿元，是 2020 年 GDP 总量的 1.67 倍；到 2060 年，中国 GDP 总量约为 420 万亿元左右，是 2020 年 GDP 总量的 4.12 倍。

在上述假设下，给定其它三个因素不变，化石能源二氧化碳排放总量将从 2020 年的 99 亿吨增长至 2030 年的 152 亿吨，约增加 53 亿吨。

### 2、产业结构

产业结构也是影响化石能源碳排放量非常重要的因素之一。工业部门是化石能源“大户”，这意味着在 GDP 总量相同的情况下，工业部门占比越高，碳排放量越多。

#### 1) 产业结构变迁规律

产业结构有其自身发展变化规律。无论从历史看，还是从经济发展理论看，随着经济持续发展，工业 GDP 占比继续升高，当人均 GDP 达到 1.5-2 万 2017 年国际购买力平价美元时，工业 GDP 占比会达到 40% 最高峰，然后开始下降。

上述工业 GDP 占比最高的发展阶段，美国约在上世纪 50 年代完成，欧洲约在上世纪 60 年代完成。目前大部分发达国家经济体的工业 GDP 占比在 15% 到 20% 之间。德国、日本和韩国这类工业制造力较强的国家，其工业 GDP 占比约为 25%-33%。

产业结构变化的背后有两大驱动因素：

一是需求结构变化。收入比较低时，人们的需求主要以填饱肚子的食品为主；随着收入增长，车子、房子等工业消费品开始进入人们的消费；当收入实现进一步增长，人们的需求将聚焦在好的教育、好的医疗服务、旅游休闲等服务性商品上。因此随着收入增长，国民经济需求结构会发生变化，导致产业结构随之发生变化。

二是生产成本发生变化。人均收入比较低时，劳动力成本也比较低，这时一国的优势往往集中在劳动密集型制造业。随着经济增长，人均收入上升，劳动力成本也会不断上升。此时，工业部门的生产会通过增加使用资本或机器人来实现对劳动力要素的替代。因此工业部门的生产不但有规模经济特性，而且技术水平进步率较快，这就导致随着经济增长，工业产品价格不断下跌。比如今天的笔记本电脑跟几十年前的笔记本电脑相比，价格大幅下降，但质量不断上升。相比之下，服务品的主要投入要素就是劳动力，其成本会随着经济增长和劳动力成本的上升一直上升。行业 GDP 占比是以价值进行核算的，所以即便服务品和工业品产量不变，上述价格变化会导致随着经济增长，服务业 GDP 占比上升，工业 GDP 占比下降。此外，生产成本变化也会导致经济体在全球贸易中的生产比较优势发生变化，从而影响产业结构。产业结构变化的内在规律大致如此。

#### 2) 过去 10 年我国产业结构调整

过去 10 年，我国产业结构发生了剧烈调整。2011 年我国人均 GDP 约为 1 万 2017PPP（以购买力平价计算）国际美元，工业 GDP 占比约为 46.5%；2020 年我国人均 GDP 约为 1.6 万 2017PPP 国际美元，工业 GDP 占比约为 37.8%。不难看出，10 年间我国工业 GDP 占比下降了近 9 个百分点，速度非常快。工业 GDP 占比从最高点下降同等幅度，发达国家经济体基本上都用了 30 年时间，而中国仅用 10 年就完成，这在一定程度上引发中国过早去工业化的讨论。

这种现象背后有很多原因。一是劳动力要素



变化。我国的劳动人口数量在 2013 年到 2014 年间达到顶峰，此后一路下降。在 2014-2020 年这段时间内，我国劳动力人口减少了约 4000 万。过去这些年，经常有机器人代替工人，农民工工资上涨这类新闻见诸报端，说到底这也是劳动力人口减少带来的结果。劳动力人口数量减少导致劳动力价格上升，服务业价格随之上升，产业结构也随之发生变化。二是近年来我国采取了诸如“去产能”、环境治理等强行政干预政策，这对工业增长形成一定制约，进而影响产业结构变化。

### 3) 不同行业的碳排放

目前我国碳排放量最大的是火电、钢铁、水泥和交通四个行业，其碳排放量占比分别为 44%、18%、14% 和 10%。火电为整个国民经济服务；钢铁和水泥的产量约占全球 57% 左右，虽然产量非常大，但出口量很少，主要是满足国内需求。65% 的钢铁产量用于建筑业，水泥则基本全部用于建筑业。由此不难看出，中国钢铁业和水泥业产量如此高，碳排放量如此高，主要是由建筑业的强大需求所驱使。

### 4) 超高速城市化下的建筑需求和交通运输需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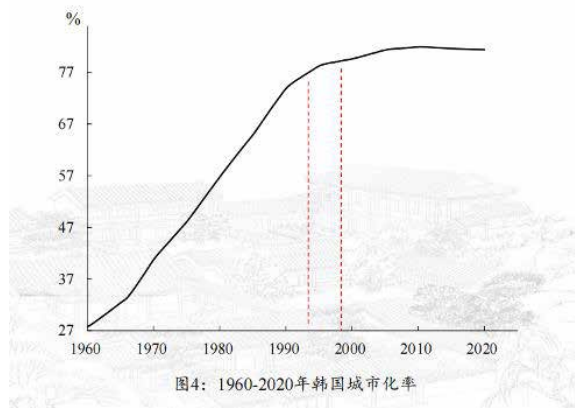
为何建筑业的需求如此高？我们需要参考另一个数据——城市化率。1990 年我国的城市化率约为 26.8%，2020 年这一比率上涨到 63.8%。这意味着 30 年时间内，我国城市化率增长近 40 个百分点。自 2000 年以来，我国的城市化率几乎是以每 10 年增长 14 个百分点的速度迅猛推进。这意味着，在我国 14 亿人口中，每 10 年就有 2 亿多人进城。毫无疑问，这必定会带来强劲的建筑需求和交通运输需求。

2000 年，我国房屋施工面积约为 6.6 亿平方米，这一数字在 2020 年已增长到 93 亿平方米，增长了近 14 倍。汽车保有量也是如此，2000 年约为 0.22 亿辆，到 2020 年已增长到 3.5 亿辆。房屋施工面积和汽车保有量的高速增长，说明我

国已经进入高速城市化的发展阶段。

每个发达经济体都会经历快速城市化的发展阶段，但一旦城市化率进入 70%-75% 这个区间，城市化的增速就会慢下来，建筑业的需求也会大幅下降。目前，我国的城市化率已达 64%。按照上述发展规律，在 10 年的时间内，我国将步入城市化增速回落的发展阶段，城市化进程也会随之慢下来。

在我看来，我国目前的城市化发展轨迹与韩国比较接近。韩国同样是后发达国家，城市化的速度非常快，甚至要快过以前所有的发达国家。下图中的数据比较直观地反映了韩国的城市化发展轨迹。1960-1992 年，韩国城市化以每年平均新增 1.5 个百分点的速度，连续 30 年一路高歌猛进。



1991-1992 年，韩国城市化率达到 75% 后，增速开始回落。此后 7 年时间内，韩国城市化增速从每年新增 1.5% 下降至 0.2% 左右。韩国走过的城市化进程再次印证了城市化的基本规律，对我国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启示。

在我看来，我国的城市化拐点可能来得更早。下图是 1991 年到 2021 年间，中国的城市化率增速情况。从 1996 年到 2016 年，我国城市化率每年新增约 1.5 个百分点，连续 20 年都在高速增长。这样的情况与韩国非常相似。然而从 2016 年、2017 年开始，我国城市化率增速开始

回落，2021年城市化率只增长了0.8个百分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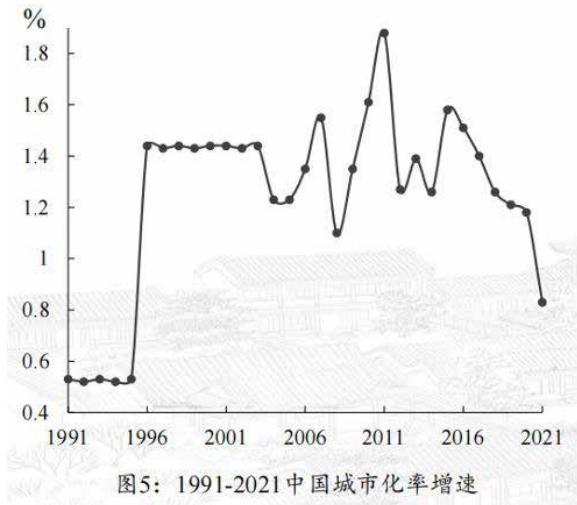


图5: 1991-2021中国城市化率增速

这背后的原因很多,需要长期观察。在我看来,主要与疫情管控有关。但与此同时,城市化增速下降也可能反映了整个人口结构或人口总量的巨大变化。

下图是 1991-2021 年间,中国新生儿人口变化情况。得益于二胎政策放开,2017 年的新生儿人口数量在连续多年下降后,再次上涨。然而在这次上涨后,断崖式下降接踵而至。2021 年的新增人口仅有 1000 多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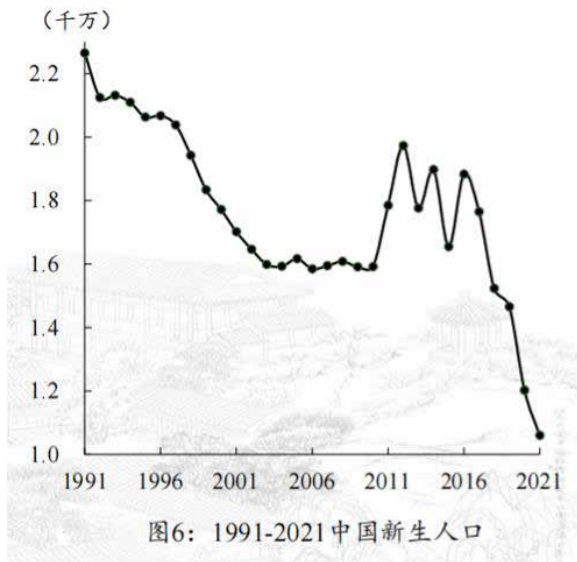


图6: 1991-2021中国新生儿人口

此外,我国的人口总量也出现一些结构性变化。今年我国人口增长大概率为负,这可能是过去四五十年以来我国人口增长首次为负。

这一情况对我们理解未来经济发展至关重要。在人口总量和城市化率增速双双下降的背景下,建筑与交通的需求随之回落。未来 5 到 10 年,钢铁、水泥行业的需求或将发生巨大变化。今年房地产销售不景气,这固然与宏观经济“去杠杆”有关,也可能与城市化增速大幅回落有关。虽然在一些核心地区和黄金地段,房价依然坚挺,但从全国平均水平看,特别是在城市化率和人口总量变化的大背景下,房地产市场或将再也无法回到过去那种高速增长的时代。

基于以上原因,我认为到 2030 年,工业 GDP 占比仍会下降,保守估计从 38% 下降到 32% 左右。仅产业结构变化这一项,可能带动化石能源的碳排放量下降 18 亿吨。

### 3、技术水平

我国许多高碳排放行业的技术水平,其实已经位居世界前列。比如水泥行业基本采用新型干法生产技术。2020 年底,全国实现超低排放的燃煤机组达到 9.5 亿千瓦,占煤电总装机容量的 88%。重点统计钢铁企业吨钢综合能耗从 2006 年的 640 千克标煤下降到 2020 年的 545 千克标煤。这样的能耗水平与日本差不多。

放眼未来,我国还有一定的潜在技术进步空间。这些高碳排放行业都有潜在技术可替代。比如煤电的技术替代有天然气、核电、水电、风电和光伏等;钢铁业有电炉炼钢、氢能炼钢;水泥则有工业垃圾、生物燃料和电力来替代。

交通运输方面,新能源汽车的发展超过想象。今年新能源汽车的销售量可能占汽车总销售量的 20% 左右。以前有许多预测认为到 2025 才能达到这一水平,目前看今年就能实现这一目标。

GDP 单位能耗由经济产业结构与技术共同决定。假定 2030 年单位 GDP 能耗相比 2020

年下降 24% 以及未来 10 年 GDP 增速每年约为 5%，一次能源的总消费增量将维持在平均每年增长 2.2% 左右的水平。在上述基础上，工业技术进步带来的化石能源二氧化碳排放或将下降约 12 亿吨。

#### 4、能源结构

碳排放主要来自化石能源，因此在整个能源结构中，清洁能源或非化石能源占比就额外重要。2020 年，煤炭、石油、天然气、核电、水电、风电和光伏在我国一次能源总消费量中的占比分别为 56.6%、19.6%、8.2%、2.2%、8.1%、2.8% 和 1.6%。在这些能源中，非化石能源占比为 15.7%。

2020 年，全球、美国和欧盟核电占一次能源总消费的比重分别为 4.4%、8% 和 11%；天然气占比分别是 25%、34% 和 24.5%。相对全球水平，我国煤炭占比过高，天然气和核电的占比过低。

能源结构转型主要是从化石能源转向清洁能源。目前，我国可再生能源主要面临发电不稳定的巨大挑战。一旦遭遇干旱和恶劣天气，水电、风电、光伏都可能断供，短期很难支撑整个电力体系。因此想要替代化石能源，短期还得靠核电和天然气。核电方面我国具备一些优势。天然气方面，我国没有足够的资源储备，主要依赖进口。

目前我国的核电技术，包括第三代核电技术，在全球位居前列。核电面临最大的挑战来自政策领域。出于对核泄漏的担心，我国几个核电站都建在沿海地区，比如秦山核电站、大亚湾核电站。相比之下，法国的核电站基本都建在内陆，美国的核电站也是如此。实际上我国的核电技术安全系数较高，我认为至少可以先从项目论证层面，考虑在内地部署一些核电站。

由于不同能源之间都存在一定替代性，决定能源结构的主要因素是能源的相对价格。这意味着哪种能源价格低，其占比就高。我国的资源禀

赋是煤多、油和气相对不足，因此煤价相对便宜，其在整个能源结构中的占比也相对较高。

传统化石能源的优点是供给稳定，缺点则是污染排放和碳排放太高。核电的优点也是供给稳定，但缺点则是民众对核安全有恐惧心理以及发电成本也比较高。放眼未来，新能源生产具有规模经济优势。2010 年到 2020 年，全球光伏电站、陆上风电、海上风电、光热发电和电动车电池成本分别下降 85%、56%、48%、68% 和 89%。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成本还将进一步下降。很多研究报告已将新能源列为实现碳中和的主要能源品种之一，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新能源的光明前景。目前，性能不稳定是新能源面临的主要挑战之一，这一问题最终还是要依靠技术解决。

2010-2020 年，我国非化石能源占比上升约 7 个百分点。这其中核电、水电和风光电分别贡献 1.56%、1.67% 和 4%。在过去 10 年，我国清洁能源发展主要以风电和光伏为主。未来 10 年随着风电、光伏的技术进步和成本进一步下降，2030 年我国非化石能源的占比或将从 2020 年的 15.4% 增长至 25%，减少化石能源二氧化碳排放约 13 亿吨。

#### 5、2030 碳排放展望

基于以上所有测算，到 2030 年我国经济总量可能增加约 53 亿吨的二氧化碳排放；产业结构调整可能减少 18 亿吨二氧化碳排放；工业部门的技术进步可能减少 12 亿吨二氧化碳排放；能源结构调整可能减少 13 亿吨二氧化碳排放。到 2030 年，化石能源二氧化碳排放量约为 109 亿吨。考虑到人口和产业结构的趋势性变化，2030 年我国减排的宏观环境相对宽松。

在此我想特别强调一点，实现双碳目标是一项长期性任务，在落实相关政策时，我们需要尊重经济发展规律，采取适宜的减排政策，尽量减少对经济的影响，努力实现经济发展与低碳生活的有机结合，不宜急于求成。



## 6、2060 年碳中和展望

在我看来有几大趋势非常重要。

一、2030 年以后，随着城市化增速逐步放缓，能源消费增长也会随之大幅度下降。1961-1979 年间，城市化增速快速攀升，欧盟国家的能源消费年平均增长是 4.14%，美国为 2.94%。在之后的 40 年里，这两个数字分别降至 0.58% 和 0.83%。从 2001 年到 2011 年，中国能源消费年均增长 9.4%。这一数据在 2012 年到 2020 年间已下降至 2.9%。考虑城市化增速与人口总量下降的大背景，在 2030 年后中国能源消费年均增速不会高于 1%。

二、在能源总需求下降的背景下，进一步依靠三方面的低碳技术：清洁能源替代、碳捕捉技术和农林碳汇。若能做到“三管齐下”，我认为我国具备在 2060 年实现碳中和的潜力。

之所以要在 2060 年实现碳中和，这其中也有战略层面的考量。所有的发达经济体，比如美国和欧洲，全部提出要在 2050 年实现碳中和。实现碳中和主要靠技术。如果发达经济体能如期实现目标，就意味着届时诸如储能、氢能、新能源汽车、碳捕捉等技术已经相对成熟。基于我国强大的工业制造能力，在 10 年时间内，针对这些成熟技术进行规模化生产，以此实现碳中和是完全有可能的。倘若发达经济体无法如期实现碳中和目标，那它们也不能要求中国在 2060 年实现碳中和。

因此，无论从哪个方面考虑，实现双碳目标都没必要在短期内急于求成，更不需要把控制能源需求作为实现双碳目标的达成手段。

### 可供选择的政策思路

从经济学的角度看，碳排放本身就是一个外部性问题和市场失灵问题。所谓“外部性问题”指的是碳排放引发气候变化，对整个人类的生态、

健康和经济增长带来损害和成本，但排碳的生产部门或个人却没有因此支付任何成本。所谓“市场失灵问题”指的是如果碳排放本身没有价格，它就会引发市场失灵，因为市场配置资源主要靠价格机制。因此，想要解决碳排放问题必须有政府的参与或干预。

从理论上讲，在全社会范围内进行碳减排的最优策略就是坚持边际减排成本原则。具体来说，哪个经济主体或哪家企业的边际减排成本低，就该多减排；边际减排成本高的就少减排；直到所有企业的边际减排成本相等为止。这样一来，边际减排成本相等的资源配置状态就能在整个社会范围内实现成本最小化的减排安排。

实现上述原则主要靠两大类政策，一是行政命令，二是市场化价格政策。实现双碳目标也是如此。

#### 1、行政命令政策

我国行政命令主要是依赖中央设定政策目标、地方层层分解落实。比如停止审批或直接关停高能耗、高污染企业、设置强制性减排目标、强制安装减排设备、设置排放标准等。

行政命令政策的优点是责任清楚、见效快；缺点则是无法解决信息问题。刚刚我们提到“最优减排基于边际减排成本原则”，由于企业的信息分布非常分散，政府很难全盘掌握。倘若将目标层层分解，分解到地方政府这一层时，是很难按照“成本低的多减排，成本高的少减排”这一原则开展工作。无奈之下，地方政府只能以一些看得见摸得着的具体指标为落脚点，进行强制减排。装机容量、钢炉的容量、企业规模大小等指标都可能成为地方政府执行行政命令政策的落脚点。这就很容易导致“一刀切”，简单粗暴且社会综合成本过高。

通过研究我们发现，政府的环保政策通常让民营小企业“最受伤”。国民经济是个有机的系统，之所以会取得如此大的成就，靠的是市场分工，而分工背后靠的是系统的协同。某些“一刀切”的行



政命令可能会破坏系统的协同，且治标不治本。

行政命令控制主要有三大类做法。一是通过控制产出实现减排，比如去产能，拉闸限电，停止两高项目审批等措施。二是通过控制能源使用量来进行碳减排，比如能耗“双控”。三是直接控制碳排放的量，比如设立排放标准和强制性的减排目标。

环境经济学的研究发现，上述三大类行政命令措施，实施效果最差的就是控制产出，控制能源使用量次之，效果最好的是直接控制碳排放量的政策。道理很简单，同为行政命令，这三种不同政策给予企业减排选择空间是依次增加的，从而导致对企业生产经营的负面影响也是依次递减的。倘若我们要采用行政命令政策，最优选择还是应直接对碳排放进行控制。去年12月举行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也强调，“创造条件尽早实现能耗‘双控’向碳排放总量和强度‘双控’转变，加快形成减污降碳的激励约束机制。”

## 2、市场化价格政策

市场化价格政策的本质就是给碳排放定价，从免费排放转为有价排放。有了价格，企业可以根据碳价自行决定如何投资减排设备、如何降低生产能耗、如何缩减产能以及是否应该关停、退出市场。这样做的好处是，单个企业最优减排的策略是边际减排成本等于碳价；当所有企业面临同一个碳价实施减排活动，就能在理论上实现所有企业边际减排成本相等，从而最小化全社会碳减排成本。这就有助于形成碳减排的长效机制。此外，碳价政策也可以为清洁能源替代和低碳技术研发创新提供市场激励。

给碳排放定价主要有碳税和碳排放权交易两种方式。从理论实践看，欧盟主要采用碳排放权交易，搭配一定比例的碳税。碳税具体标准由各个国家自己制定，欧盟层面没有碳税。美国则是部分州建立了碳排放权交易市场。

碳税和碳排放权交易各有优劣势。碳税是先由政府定碳价，再由市场决定最终碳排放量。碳

排放权交易则是先由政府定碳排放总量，再由市场决定碳价。综合来看，“双碳”目标旨在控制总量，跟碳排放权交易权更为契合，但碳排放权交易权也容易引发数据造假、交易成本高、市场垄断、地方政府缺乏激励等问题。

## 3、政策思路小结

给定前面的分析，包括2030年前后我国经济发展的背景，总体我国实现“碳达峰”的宏观环境比较宽松。但与美国等发达国家相比，目前我国人均GDP水平较低，在经济低水平时就进行高水平的减排，压力其实很大，因此也决不能掉以轻心。

在我看来，我国不应采取不计成本、“一刀切”的泛行政化方式进行运动式减排。在充分尊重经济发展和碳排放发展规律的前提下，我国应首选利用市场和碳价政策来解决能耗和二氧化碳排放过快增长的问题。如果退而求其次，一定要选择行政命令政策，我认为应首选碳排放控制政策，不需要也不应该考虑利用产出控制政策和能源使用控制政策进行碳减排。

1. 统一共识，确立以碳排放权交易和碳价机制为主导的政策思路，建立部门间“双碳”政策的协调机制。目前我国的双碳政策缺乏部门间协调机制。各个部门各种双碳政策“叠加”也导致企业政策性负担过重。要解决碳排放问题还是要依靠市场和碳价机制。如果能在中央层面对此形成共识，就可以考虑取消两高项目审批、能耗双控等效率过低且易破坏市场经济运行的强行政命令政策，而把实现“双碳”目标的政策重心放在碳排放权市场交易和碳税这样的碳价机制上面。

2. 逐步扩大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范围，适时实施碳排放权总量控制。在2025年前，将钢铁、水泥、石化等“两高”生产性行业纳入碳排放权交易市场范围。在“十五五”期间，适时将交通运输、建筑用暖等直接涉及民生的碳排放行业纳入碳排放权交易市场范围。与此同时，我们应尽早将碳汇纳入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到2028





年左右，对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实施配额总量控制。

3. 对于未纳入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的非点源碳排放，可考虑碳适应的碳税政策。

4. 深化电力市场改革，释放可再生能源发电的市场竞争优势。大比例提高可再生能源占比是实现“双碳”目标的重要举措。但如何解决可再生能源供给不稳定的问题？目前主要依靠电网调度和储能问题来解决。建议引入电力间歇不稳定性的市场化定价机制，设立储能定价和调峰辅助服务定价机制。与此同时，建立跨省区的区域电力交易市场，在更大电网范围内，促进可再生能

源电力的调度和消纳。

5. 尽快推动电力价格市场化改革，逐步取消电力价格管制和交叉价格补贴。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我们已经习惯关系到民生的商品价格定价不能太高，这导致我国居民电价在过去一直实行交叉补贴，价格水平低于电力供应成本。然而，碳价机制全面发挥作用需要有效价格传导机制。我们不仅要给碳排放定价，还要让这种价格传导到火电企业、发电企业、以及每一个用电的企业和个人。只有这样，才能在全社会的范围内真正实现一个节约用电，减少碳排放的机制。不理顺价格机制，碳税交易市场的效果也会打折扣。

## 曾国藩如何走出极困极难时刻<sup>12</sup>

宫玉振

北大国发院管理学教授、BiMBA 商学院副院长、学术委员会副主任

目前，大部分中国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面临着很大的挑战。挑战来源于疫情、市场、国际格局变化等诸方面。怎么度过这样极其困难的时刻？希望曾国藩的经历能够给大家提供一些启发。

### 引子：余平生长进，全在受挫受辱之时

今天的话题先从曾国藩的一首诗说起：

左列钟铭右谤书，人间随处有乘除。

低头一拜屠羊说，万事浮云过太虚。

据说 TCL 董事长李东升先生特别喜欢这首诗，专门将这首诗挂在了自己办公室里。李东升先生被誉为“左手韦尔奇，右手曾国藩”，是中西合璧的企业家。去年 12 月，我应邀参加中国企业家俱乐部在海口举行的年会，见到了李东升董事长，就跟他求证这个传言是否属实。他说：是的，确有其事。2000 年左右，TCL 在发展过程中遇到了很多挑战，内外交困。他说自己那段时间特别焦躁，但在读到这首诗之后，内心一下子平静下来，从此以后就非常喜欢这首诗。

这首诗是曾国藩写给弟弟曾国荃的。曾国荃打下南京之后，满心以为清政府会给他大赏，但是没想到清政府反而忌惮他功高震主，追究他的失误和责任。同时，各种各样的嘲讽、猜忌全部

压了过来。重重压力之下，曾国荃不得不以生病为理由辞职回家。这是曾国荃一生最低落的时期。曾国藩特作此诗来开导曾国荃。

“左列钟铭右谤书”。你立下大功，做成大事，国君为了表示不忘你的功劳，特意铸了一口钟，并列上了你的名字；但是，诽谤你的文书同时已经堆满了国君的桌子。

“人间随处有乘除”。这就是人生，这就是世事。有人给你做乘法，就一定会有人给你做除法。遇到顺境，也必须做好转入逆境的准备。

“低头一拜屠羊说，万事浮云过太虚”。屠羊说的故事出自《庄子·让王》。屠羊说是一个内心坦荡，对于得失成败、功名利禄看得非常淡的人。你低头一看《庄子》屠羊说的故事，就会明白成败得失、兴衰荣辱、顺境逆境，其实都是浮云而已。

这是一种非常坦荡的胸怀。

我为什么从这首诗开始讲呢？因为这首诗里面有一种力量，这种力量来自于曾国藩自己从极困极难之中走出来的经历，这种力量影响了曾国藩的弟弟曾国荃，更在 150 多年后还影响了李东升这样的优秀企业家。

曾国藩曾讲过自己一生的经历：“余生平吃数大堑，而癸丑六月不与焉。第一次壬辰年发佯生，

12. 本文根据宫玉振在2022年6月19日北大国发院EMBA论坛第65期上的演讲整理。



学台挂牌，责其文理之浅；第二庚戌年上日讲疏，内画一图甚陋，九卿中无人不冷笑而薄之；第三甲寅年岳州靖港败后，栖于高峰寺，为通省官绅所鄙夷；第四乙卯年九江败后，赧颜走入江西，又参抚、臬，丙辰被困南昌，官绅人人目笑存之。”

我这辈子啊，有几次大的困境，咸丰三年六月与湖南官场势同水火，最后被赶出长沙，那次还不算什么。

第一次是道光十二年，当时曾国藩还是秀才。学台（省级教育负责人）公开指责他的文章文理不通；第二次是道光三十年，当时曾国藩是翰林，给皇帝讲课时画的一个图特别丑，被九卿冷笑道看不起；第三次是咸丰四年，曾国藩第一次带兵，在岳州、靖港先后打了败仗，被迫在长沙城外的高峰寺暂时栖身，全省官员和士绅都用鄙夷的眼光看他；第四次是咸丰五年，他在九江再次战败，最后厚着脸皮进了江西南昌。接下来他弹劾江西巡抚和省政法负责人，结果第二年自己被困在南昌，官绅人人都兴高采烈地看他的笑话。

这就是曾国藩的“五铢”。其中第三大铢是靖港之败。当年湘军刚练成，曾国藩也没有作战经验，不太会打仗。曾国藩跟手下制定了一个打湘潭的作战计划，前面五个营由其他将领率领已经先出发了，他准备带剩下的五个营作为后应。就在他刚要带后面这五个营出发时，有靖港的民团过来报告，说是靖港的太平军防御非常薄弱，而且民团在太平军内部还有内应，所以建议曾国藩去打靖港。曾国藩认为这是一个捡漏的好机会，就临时改变了湘潭作战计划，率领剩下的五个营兴冲冲地去打靖港。没想到这是个圈套，前面的部队吃了败仗，就开始后退。前军一退，后面的部队见势不好，也掉头就跑。曾国藩眼看整个部队即将溃散，就在桥上立一杆旗，上书五个大字“过此旗者斩”。没想到湘军看到后，纷纷从旗旁绕了过去，部队很快散完了。

曾国藩本来最瞧不起一打仗就溃散的绿营兵，没想到自己辛辛苦苦练的湘军连绿营都不如。此时他跟长沙官场的关系本来就特别紧张，这样的

失败，还不知道会遭到什么样的冷嘲热讽呢。所以非常沮丧，越想越恼，在回去的船上趁人不备，一头扎到河里自杀。好在手下看出他神色不对，后面偷偷地跟着他，一看不好赶紧跳下河去，七手八脚把他捞了上来。

回到长沙后，果然是各种嘲讽都来了，有人甚至说湘军没用，干脆解散得了。曾国藩没脸进城，躲在城外的高峰寺，给皇帝写了遗折，给家里写了遗书，让弟弟准备好一口棺材，准备再自杀。但就在这时，传来了湘潭大捷的消息，他派出打湘潭的先头部队打了大胜仗回来了。这样一来，曾国藩也就不自杀了，总算过了这一关。

曾国藩自己讲的第四铢，是他在江西的经历。曾国藩在江西前期极其困难，一是仗打得不好，二是官场关系也一塌糊涂，用曾国藩自己的话说，已经到了“通国不能相容”的地步。他在给皇帝的折子中讲过他当时在江西的情况：“每闻春风之怒号，则寸心欲碎，见贼帆之上驶，则绕屋彷徨。”完全是焦头烂额、走投无路。《湘军志》的作者王闿运说，多年后他读到曾国藩给皇帝写的这个折子，不禁还要为曾国藩当年在江西之苦而泪目。

其实上面这些挫折，还都不算什么。曾国藩最大的失败，是咸丰七年跟皇帝要官未成，反遭罢免。曾国藩在江西南昌时处境极差，他认为原因是自己没有地盘、没有权力，所以他给皇帝写了一个折子，意思是没有巡抚的位子就没办法带兵，即使能带兵也无法筹饷，我现在“处客寄虚悬之位，又无圆通济变之术”，再这样下去恐怕要给你贻误大局了。言外之意是你再不给我巡抚，那我不干了。没想到曾国藩高估了自己在皇帝心中的分量，官没有要成，反而被皇帝剥夺了兵权，被迫回家守制一年多的时间，这一年多是他一生真正的至暗时刻。但曾国藩最终还是挺了过来，并且就是在这个过程中大悔大悟、脱胎换骨，迎来一生真正的辉煌。

今天我们看曾国藩的一生并不平顺，屡战屡败，但他屡败屡战。梁启超对曾国藩有一段评价，说曾国藩并没有超群绝伦的才华，在同时期的杰

出人物中是最笨的一个，一生一直处于逆境，但最后立德、立功、立言，达到了三不朽，其成就震古烁今，无人可比，原因就是“其一生得力，在立志自拔于流俗。而困而知，而勉而行，历百千艰阻而不挫屈，不求近效，铢积寸累。受之以虚，将之以勤，植之以刚，贞之以恒，帅之以诚，勇猛精进，坚苦卓绝，如斯而已，如斯而已！”在梁启超看来，曾国藩的成就完全是在逆境中困知勉行，锤炼而成。曾国藩自己也讲过一句话：“吾生平长进，全在受挫受辱之时。”挫折屈辱，反而变成了曾国藩提升自我的最好机会。

当我们遇到逆境的时候，一般会有两种反应：一种是放弃、沮丧、抱怨、悲观，另一种是积极奋斗、不屈不挠、愈挫愈勇。逆境中最能体现出一个人的领导力水平。我讲过一句话：逆境是企业和企业家的成人礼。人生亦如此，如何看待逆境至关重要。逆境中不同人的不同的反应与选择，往往是不同人生的分水岭。湘军统帅胡林翼曾经讲过一句话我非常喜欢：“世自乱而我心自治，斯为正道。”越是在动荡和不确定的环境，就越要找到自己内心确定的东西，从而用从容和定力去应对逆境和不确定。的确，我们不能改变大的外部环境，不能改变处于逆境的现实，但人是有能动性的，我们可以决定自己的心态与反应，决定应对逆境和困难时的选择。人与人之间的区别其实就在此处，组织和组织之间拉开距离也在此处。

曾国藩究竟是怎么走出极困极难时刻的？四个字：耐、裕、强、悔。这都是他从自身的经历中总结出来的。

## 耐

第一个字：“耐”。耐就是耐烦，耐得住烦躁，控制好情绪，调整好心态，也就是我们今天讲的情绪管理。

遇到逆境、遇到困难，人本能的反应是什么？就是焦虑、抑郁，情绪化。但是，所有人都可以焦虑，

管理者不能焦虑；所有人都可以沮丧，管理者不能沮丧。相反，管理者必须把信心传递给组织的每个成员。保持情绪稳定，保持良好心态，是管理者做出正确决策的前提，是给团队提供信心的基础。所以曾国藩讲，“做官以‘耐烦’为第一要义”。耐得住烦躁、控制好情绪，这是管理的首要原则，是管理的入门工夫。“若遇棘手之际，须从‘耐烦’二字痛下工夫。”尤其是事情不顺、内心焦躁的时候，一定要在“耐烦”两个字上痛下一番工夫。

曾国藩曾经夫子自道说：“吾服官多年，亦常在‘耐劳忍气’四字上做工夫。”我做了这么多年的官，也要必须随时提醒自己要耐得住劳累，忍得住气恼。在他看来，作为管理者，遇到不顺的时候，最忌讳的就是控制不好情绪，轻易发牢骚。他讲：“牢骚太甚者，其后必多抑塞。盖无故而怨天，则天必不许；无故而尤人，则人必不服。”一个人如果牢骚太多，他的前途肯定不会顺利了。因为无缘无故地抱怨老天，老天一定不会允许；无缘无故地怪罪别人，别人一定不会心服。很简单的道理，怨天尤人不但于事无补，反而使你的心态无法平和，你的决策也就不可能妥当，更重要的是，你经常传播负能量，你的组织也就不可能有信心。这是领导者在遇到困境时候的大忌，也是考验管理者是否成熟的最根本一条标准。

曾国藩非常喜欢写对联，他经常把自己对人生的体悟写成对联跟朋友和家人分享。他写的对联往往很通俗，但很深刻、很耐人寻味。他有这样一副对联：“天下断无易处之境遇，人间哪有空闲的光阴”。你看都是大白话，但是非常有味道。什么叫“天下断无易处之境遇”？天底下哪有那么容易顺的境遇？一个组织之所以需要管理者，一定是需要你来解决问题的。如果组织没有任何问题，还需要管理者干什么呢？管理者天然就要面对问题、解决问题，这是你的职责所在，也是你的价值所在。从你创业那天开始、从你晋升为管理岗那天开始，这就应该是你的常态，是你必须接受的现实。逆境本来就是管理的组成部分，



我们能做的就是要用平和的心态来对待。

他还写过一副对联，是他被皇帝赶回家为父亲守制期间所作，现悬挂在他的旧居思云馆的门口：“不怨不尤，但反身争个一壁静；勿忘勿助，看平地长得万丈高”。

这副对联同样耐人寻味。上联“不怨不尤”，讲的是当人生或事业遇到挫折时，最忌讳的就是怨天尤人、灰心丧气。这样的情绪非但于事无补，反而会自乱阵脚，最后受伤害的一定是自己。逆境是最好的压力测试器。正确做法是“反身争个一壁静”，借机反省自己，找出自身的问题与不足，积极改进和提升。这样，就可以用平和的心态，在自身或组织的成长发展方面下工夫，从而把不顺和困难变成最好的成长机会，“增益其所不能”。

下联“勿忘勿助”，讲的是千万不要因为一时的不顺就轻易放弃、沮丧、躺平，这是“勿忘”；也不要因为一时的焦躁就轻举妄动、急于求成，这是“勿助”。世上很少有一帆风顺、一直高开高走的人生，任何一个管理者、组织都会经历困境，哪一个创业者没有经历一般人不愿意承受的煎熬或屈辱？如果你因为不顺心就不耐烦，因为不耐烦就会更加不顺心，你只会越来越焦躁，最终必然一事无成。“看平地长得万丈高”，只要保持镇定从容的心态，耐心地着眼于自身的成长，总有一天，原本不起眼的小树苗一定会长成参天大树。

这就是曾国藩的心态，就是今天讲的自控力。在他看来，这种在逆境中的自控力、耐烦，是决定一个人成就的关键因素。

所以他曾经讲过，“观古今来成大功、享全名者，非必才盖一世。大抵能下人，斯能上人；能忍人，斯能胜人。”他发现一个规律，古今获得巨大成功的人，未必是最聪明的人。大致说来，能在别人面前保持低姿态的人，才能领导众人；对人宽容大度、忍耐克制的人，才能胜人一筹。你看，对于管理者来说，才华固然很重要，控制情绪、调整心态更加关键。

因此，在困境之中修炼心态和情绪，这对于领导者而言是一门必修课。这就是为什么曾国藩提醒管理者要以“耐烦”为第一要义。

## 裕

第二个字：“裕”，宽裕，就是要放宽心。我们在逆境中为什么会焦虑抑郁？其实是因为对得失、成败看得太重。所以应对逆境非常重要的一条原则，就是要把得失成败放下，从而保持宽广的胸怀、坦荡的心境。

曾国藩曾经讲过一句话：“宦海风波，极无常态。得时则一岁九迁，失势则一落千丈。”官场上风波无常，运气来了可能一年连升九级，一旦失势则一落千丈。曾国藩自己就曾经一年升过四级，但也曾经一下子跌落人生低谷。这种急剧的动荡，对人的心态会造成极大影响，而曾国藩很清楚，官场无常，才是官场的常态。

所以他跟朋友讲：“宦海之风波，仕途之通塞。非意料所能预期，亦非人谋所可自主。”个人和组织的发展中很多因素不是自己能够提前预料的，也不是自己能左右的，曾国藩把这些因素归于运气，他说“运气之说，贤者所不屑道，而鄙人则笃信不移”，所以他经常劝人放宽心，耐心等待命运的安排。

他认为，《周易》里的屯卦、否卦、蹇卦、困卦，都是教人“居之以裕，守之以贞”。这几个卦象都是艰难困苦，而卦辞和爻辞中传递的基本含义就是让人放宽心，耐心等待。《周易》影响了中国人的人生哲学，也深深影响了曾国藩。《周易》一个核心思想是否极泰来，泰极否来。一个人不可能一直顺利，顺利到极致的时候往往就会遇到挫折；一个人也不可能永远处于低谷，大势早晚有一天会往上走，从而帮助我们走出逆境。所以逆境之中这个“裕”字就特别重要。

曾国藩对“裕”这个字非常看重。他说《易经》里的需卦二爻，处险之道曰“衍”。晋卦二爻，



处险之道曰“裕”。他认为“衍”和“裕”都是“宽”的意思。

曾国藩的手下陈澧一度发展不顺，处境艰难，他在给陈澧的信中勉励他以“宽”字自养。他说，如果能够把心放宽，调整好自己的心态，放在宽阔泰然之处，身体就不会孱弱，志气也不会颓废，然后就可以从容不迫地找到走出困境之路。不管外部环境如何，应该做到“将此心放得宽，养得灵，有活泼泼之胸襟，有坦荡荡之意境”。这是曾国藩希望自己和手下在困境中具备的基本心态。

曾国藩还曾经引用过朱熹的一段话，“人之于患难，只有一个处置。尽人谋之后，却须泰然处之”。遇到挫折、遇到困境，我们当然要尽力而为，但自己尽了所有心力以后，结果如何就不再是自己所能掌控的，这时候就要学会泰然、释然，接受任何结果，不要心心念念全在结果得失之中。

所以他讲，他自己对于所有事情都守八个字——“尽其在我，听其在天”。我该做的事情一定要尽心尽力，全力以赴，但是结果如何就要听其自然。这就是逆境中明智的做法，是坦荡的胸怀。

这其中的核心，就是放下得失成败。如上所言，我们会焦虑、抑郁，往往是因为将得失成败看得太重。所以曾国藩讲，“于毁誉祸福置之度外，此是根本第一层功夫。”就是把得失成败、面子、别人的评价全部放下。“此处有定力，到处皆坦途”，这方面有了定力，一下子就柳暗花明了。他的座右铭之一是“莫问收获，只问耕耘。”不要过于关注结果的成败得失，只要把该做的事情踏踏实实做好就够了。

“物来顺应，未来不迎，当时不杂，既过不恋。”曾国藩的这句名言相信很多朋友都知道。事情到来了发生了，那就顺势而为；没有发生的事情，不要牵挂忧虑；今天应该做的事情，要一心一意做好；已经过去的事情，不管结果如何，全部放下。这样的心态可以让你静下心来实实在在地去

做好眼前的每一步。未来是一个个今天组成的，只要把一个个的今天做好，自然就会有好的未来，自然就可以走出困境。

他还曾经写过一副对联：“战战兢兢，即生时不忘地狱；坦坦荡荡，虽逆境亦畅天怀。”这副对联也写得特别好。越是顺利时，越要提醒自己小心谨慎，因为天堂和地狱只是一步之差；越是在逆境之中，反而越要坦坦荡荡，要舒畅自己的天怀，有一种宽阔的胸怀。一般人在顺利的时候容易张扬，在逆境中容易抑郁。曾国藩正好相反，顺利的时候提醒自己要学会收敛，逆境中反而要学会开怀。

天下没有过不去的槛，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就算是人生最艰难的时刻，我们也依然可以找到生命的乐趣。这其中的关键，就看你的是心胸与心态。心大了，事就小了；心小了，事自然就大了。心宽天地宽，要始终保持心境的坦荡。所以曾国藩讲“盛世创业之英雄，以襟怀豁达为第一义”。心胸开阔、襟怀坦荡，是英雄豪杰的共同特质，也是他们能够创业成功的基础。

## 强

第三个字是“强”，就是倔强、刚强、坚韧不拔，就是不服输的精神。

曾国藩非常看重“强”这个字。他说自古以来，帝王将相没有一个人不是从自立自强做起的。所以他给弟弟写信强调，不管做事还是写文章，“倔强”二字绝不能少，否则根本成不了事。他认为，他和弟弟的性格受母亲影响很大，好处就在于倔强。并且，他的祖父曾玉屏也一直教导曾家子孙“以‘懦弱无刚’四字为大耻”，要求他们“男儿自立，必须有倔强之气”。就是有一种不服输的精神。

曾国藩曾经回顾自己的一生经历说，他办的湘军水师，一败于靖港，再败于湖口。这些都是耻辱性的失败，但是他都咬紧牙关把局面维持了下来，而后终于迎来重振之机。安庆没有合围时，



祁门大营十分危急，黄德的局势也很危险。大家都建议他撤安庆之围，以支援祁门和黄德，但他咬紧牙关不撤，终于打下安庆。此战之后太平天国大势已去。

他还回忆道，南京也是这样，方圆百里大城，易守难攻，他却命曾国荃用一支部队把南京围起来，大家都说恐怕要重蹈清军覆辙，但他咬牙坚持，最后立大功。所以他总结说，由此可见，一个人如果刚受挫折，或听到别人不切实际的议论，就心情沮丧，改变计划，那是很难成事的。

战争中，我们通常看到的是士兵在前线厮杀，其实承受最大压力的，是战争的决策者。这种压力对于组织是真正的考验。“强”字就是强大的意志力，是一种坚持。如果没有曾国藩的倔强，没有困境下依然坚持到底的意志力，很难熬过那么长时间反复拉锯一样的战争。

曾国藩有个幕僚叫李申夫，曾经说曾国藩有个特点，就是跟别人怄气从来不说出来，一直忍耐，然后一步步寻找自强之道，还引用了“好汉打脱牙，和血吞”这句话。曾国藩说，这就是他咬牙立志的诀窍，没想到被李申夫看破了。他自己当年被京城的权贵、长沙官场、江西官场唾骂，还经历过岳州之败、靖港之败、湖口之败，“盖打脱牙之时多矣，无一次不和血吞之”。

他在给弟弟曾国荃的一封信中说，你来信经常怪运气不好，这不像好汉之言。他要求弟弟“唯有一字不说，咬定牙根，徐图自强。”

他还说过一句名言：“凡事皆有极困极难之时，打得通的，便是好汉。”做事总是会遇到极其困难的时候，你挺直了、打通了，就会脱胎换骨，就会成为真正的好汉。“困心横虑，正是磨炼英雄，玉汝于成。”艰难困苦，正是上天要将你磨炼成英雄的好机会。真正的英雄从哪里来的？一步一步磨炼出来的。所以他相信，天下事只在于人如何去做，到山穷水尽时自然会有路走。一个人如果经历千磨百折，依然坚持定力，最终一定成功。

这就是曾国藩的性格，一生如此。他有一个

人生信条——“成败听之于天，毁誉听之于人。”成败、毁誉，都不是自己所能左右，能做的就是自己有定力，肯坚持。他曾经跟别人开玩笑说准备写一本书叫《挺经》，“挺”的含义很多，核心含义就是要挺直了，不能趴下。他还跟别人开玩笑，说有朋友说他死了以后，皇帝应该给他一个谥号叫“文韧公”。“韧”，就是坚忍不拔。这是他对于自己性格里面最得意的地方。

丘吉尔人生最后一次演讲是在剑桥大学的毕业典礼上，当时他已经老得几乎说不出话，十多分钟的演讲其实就是反复在讲一句话：“Never give up！”翻译成中文，就是“永不放弃”。这位老人用自己一生的经历告诉这些即将走向社会的的大学生，人生的成功秘诀非常简单，就是永不放弃。这也就是曾国藩讲的倔强之气、不服输的坚毅精神。所以“强”，就是看明白以后不放弃的定力，这是曾国藩能够走出逆境很重要的一个字。

## 悔

“悔”就是要反思，改过，要看清自己的错误和缺点，把逆境变成一个自我成长和组织提升的机会。

当年曾国荃给他写信，希望哥哥能指点人生。曾国藩回信说，扪心自问这几年为什么做得还行，靠的就是一个“悔”字，也就是自我反思反省。然后他讲，曾经自认为很了不起，无所不能，看到的都是别人的问题。但是自从丁巳年、戊午年被皇帝赶回家那一年多，他大悔大悟、脱胎换骨，才明白自己没有多大本事，后来遇到问题看到的都是他人正确的方面。之后，他的心态和四十岁以前完全不同。

如果熟悉曾国藩的人生经历，会知道他所说的丁巳年到戊午年大悔大悟，是他一生最大的转折点。他怎么从至暗时刻走出来？除了“强”，就是“悔”。“强”是挺住，“悔”是成长，就

是把逆境变成反思和成长的好机会。

我们今天经常讲一句话：“不要浪费一场好危机”。“悔”的含义就是，千万不要辜负了你的逆境。平时，组织也好、个人也好，其实都会有惰性。挑战、压力、逆境会逼着我们脱胎换骨，因为在逆境当中才能更清楚地看出自己的优势和劣势。所以，一定要把逆境和困难看作人和组织反省自我、提升自我的最好机会。

曾国藩给弟弟曾国荃写信说，“朱子尝言：‘悔’字如春，万物蕴蓄初发。”朱熹说过，在逆境之中要保持生机，而生机就来自于“悔”这个字。所以曾国藩勉励弟弟说，“当此艰危之际，若能以‘硬’字法冬藏之德，以‘悔’字启春生之机，庶几可挽回一二乎？”遇到逆境，要以“硬”字学会收敛，同时以“悔”字开启未来的生机。

“硬”其实就是前面说的“强”，所以曾国藩特别看重把“强”和“悔”两个字一起看。曾国荃有一段时间特别不顺，鲍超和刘铭传争功劳，导致湘军和淮军产生了矛盾，曾国荃和李鸿章之间也因此出现了冲突，所以曾国荃当时遇到的压力特别大。曾国藩给曾国荃回信说，你现在遇到各种不顺，但是“事已如此，亦只有逆来顺受之法，仍不外‘悔’字诀、‘硬’字诀而已。”这里的“逆来顺受”不是我们通常理解的意思，而是指要坦然经受已经处于逆境的现实。坦然接受是第一步，接下来要靠“悔”字诀反省自己，靠“硬”字诀坚持住，不要轻易认输。在曾国藩看来，其实这就是一人突破自我，实现成长的关键。

他曾说，“圣贤之所以为圣，佛家之所以成佛，所争皆在大难磨折之日。”大难的折磨，是自我磨练、提升修养、拉开与他人距离的最好机会。

## 结束语：志之所向，金石为开

耐、裕、强、悔，四个字都很重要，但还不足以解释曾国藩为什么能够走出极困极难时刻。

晚清朱孔彰写的《中兴将帅别传》中对曾国

藩的评价是“履危濒死屡矣，有百折不挠之志”。就是说他一生遇到各种各样的危险，甚至一次次濒临死地，但是他的志向目标从来没有动摇过。

民国学者龙梦荪评价曾国藩，“虽极人世艰苦之境，而曾不少易其心；虽遇千挫百折之阻，亦不足以夺其志。”曾国藩这一生遍尝人间最艰苦的逆境，但是他的心从未动摇过；虽然遇到了千难百险各种阻挠，但从来没有令他改变人生志向。

曾国藩相信“志之所向，金石为开”。只要志向足够坚定，再坚固的金石都可以为之打开。胡林翼也讲，“兵可挫而气不可挫，气可偶挫而志不可挫。”我们做企业和打仗是一个道理，暂时的失败很正常，企业总是会遇到一些问题，但是记住，士气不能受挫；即便士气偶尔受挫，这也是人之常情，但是志向绝对不能动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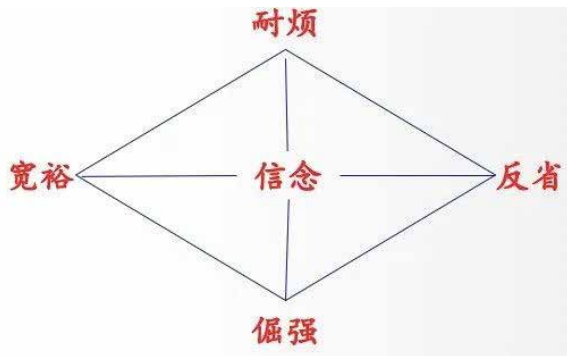
上面这四段话，最核心的一个字是什么？是“志”。这是曾国藩走出极困极难时刻最核心的东西。前面我们讲过“强”，“强”不单是性格，更主要的是一种信念。所谓的“志”，就是清晰的人生与组织目标，以及对信念和志向的执着与坚持。

什么叫信念？相信正面的理念一定实现，相信困难和挫折都是暂时的。曾国藩为什么历经困难不放弃？因为在他看来，他的志向、事业早晚成功，他深信不疑。遇到困难时，信念可以充分激发出人在精神层面的力量，使人在挫折之中依然坚持自己的信念，在绝望之中依然相信自己的相信，而且能够把信心传递给组织的每个成员。事实上，你的信念越坚定，你就越不惧更大的逆境，你承受挫折的能力就越强。曾国藩具有强大的心性和意志，背后是他坚定的信念。这是帮助曾国藩走出极困极难时刻最关键的因素。

尼克松在《领导人》这本书里曾经讲过一句话，“一个人要能够经受住领导人必须经受的艰难痛苦，他就非得相信自己的事业不可。他必须相信自己，否则就不能说服别人相信他。”我想，这



是对于所有处于逆境中的领导者来讲最好的提醒。



最后做个总结，曾国藩如何走出了极困极难时刻？

一、“耐”，耐烦。

二、“裕”，宽裕，坦荡的胸怀，得失成败，学会放下。

三、“强”，倔强，不服输的精神，打脱牙和血吞。

四、“悔”，反思、反省。

五、最核心的，是“志”，也就是清晰的目标与信念。

信念是其他四条策略的力量来源，如果没有信念，其他四条只能局限在“术”的层面，不可能真正让你走过极困极难的至暗时刻。而好的领导者，即使是在最黑暗的时刻，也会眼中有光。

这是曾国藩的一生所能给今天的我们的最大启发。





一、2022年6月，世界高等教育研究机构QS发布2023年度世界大学排名（World University Rankings），北大国发院MBA项目合作院校之一UCL（英国伦敦大学学院）以综合得分95.4，继续位居全球第八位，北京大学以综合得分91.4排名全球第十二位，跃升6位。北京大学和伦敦大学学院（UCL）于2016年签署合作办学联合声明，共同开设工商管理硕士（MBA）课程项目，由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NSD）与伦敦大学学院管理学院（SoM）共同运营。

二、2022年6月25日上午，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暨南南合作与发展学院2022届毕业典礼在北大百周年纪念讲堂隆重举行。近千名国发院经济学本科、研究生和BiMBA商学院MBA、EMBA毕业生，南南学院博士和硕士毕业生，以及因疫情原因未能参加2020届毕业典礼的EMBA和MBA毕业生一同感受学有所成的喜悦和典礼的庄严。无法到现场的应届毕业生和亲属在线参与。

三、2022年6月29日，浙江大学信息资源分析与应用研究中心智库研究小组发布《全球智库影响力评价报告2021》。在全球智库TOP100排名中，北大国发院位列全球第15、经济领域第12。进入全球智库TOP20的国内智库为3家，分别是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第3名）、北大国发院（第15名）和中国工程院（第19名）。

在中国智库TOP100排名中，北大国发院排名第2（第1名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为中国高校类智库第1名。

四、2022年7月2日至4日，由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中国经济研究中心CCER）组织的“第六届CCER夏季研讨会”在国发院承泽园顺利举办。本次会议共有四个平行会场，线上、线下同时召开。来自清华大学、香港科技大学、耶鲁大学、纽约大学、宾夕法尼亚大学、多伦多大学、奥胡斯大学等国内外高校的一百余名学者就微观与产业组织、宏观、金融、国际经济、劳动与健康、发展与政治、环境与公共政策、管理等经济学和管理学问题汇报最新研究成果并展开探讨。

五、2022年7月14日，北大国发院名誉院长、南南合作与发展学院院长、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院长林毅夫教授荣获首届“北京大学参政议政服务发展同心奖”突出贡献奖。

六、2022年7月31日，北大国发院承泽论坛第四期在线上线下同步举办。北大国发院“平台经济的创新与治理”课题组与国发院智库联合主办，特邀经济、法律、管理等多个领域学者做主题分享，介绍课题研究的最新成果，并就平台经济的发展趋势、治理举措等热点和难点问题深入交流。课题组研究成果已集结为新书《平台经济：创新、治理与繁荣》，由中信出版集团2022年7月出版。



# 版 权

**主 管:**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  
**主 办:** 北大国发院智库 北大国发院传播中心  
**主 编:** 黄卓  
**执行主编:** 王贤青  
**执行副主编:** 白尧  
**编 辑 部** (按姓氏拼音)  
曹毅、高玲娜、刘海波、王勋、王志勤、朱丽

## 电子订阅方式

扫描本二维码，填写联系信息



## 合作联系方式

电话: 010-6275 9033  
邮箱: ybai@nsd.pku.edu.cn

## 官方网站

[www.nsd.pku.edu.cn](http://www.nsd.pku.edu.cn)

## 官方微信公众号



北大国发院



北大国发院智库